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人文主义 谱写新篇章

人文主义何去何从？

桑杰·赛斯

有你，故有我

迈克·翁耶布奇·埃泽

人文主义的穆斯林阶段

马哈茂德·侯赛因

全球化应以人为本

米莱尔·德尔马斯·玛蒂

欢迎来到人类世

露丝·欧文

科学梦

米哈尔·迈耶

儿童兵，未来新生活

福里斯特·惠特克

想象力的特别空间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教科文组织

2011年10月-12月

信使



作者或采访对象

2011年的教科文组织，建设新人文主义和有助于和解的全球化

1951年12月13日至20日，教科文组织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了“东西方文化和哲学关系研讨会”，会议确认了新的全体论人文主义。当时，世界大战——它打破了主导西方文化的科技进步神话——结束不久，世界需要新的人文主义指导思想。在《迈向新人文主义》文件中，参会者们提及“失去灵魂的知识迷路了”和“人文主义危机”，倡导“精神革命”和“共同的精神进步”，指出东、西方需要交流（见第27页）。

六十年后的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已经发生变化，人们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也随之而变。2011年3月，教科文组织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召开了“和平与文化间对

话高级小组会议”。小组约有二十名成员，来自五大洲。会议同意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的要求，即“对与追求21世纪新人文主义相共鸣的和平与和解进行重新思考”。

最后，会议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这一新人文主义应该植根于文化多样性、互联网时代的对话、南北方的和解[...].它必须是真正的多元主义、世界主义，能够启发世界各地的每个人进行思考，并表达他们的愿望。”

根据“建设新人文主义和有助于和解的全球化”文件，新人文主义“旨在创造具有同感、归属感和相互理解的氛围，应该认

识到人权领域的进步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以适应现代性的挑战。这些挑战只有通过道德原则才能得到解决，因为后者是我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公共领域价值’这一价值的基础。”

3月11日高级小组会议决定（仅有英、法文版），请参考：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9/001923/192362e.pdf>
（英文）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9/001923/192362f.pdf>
（法文）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组织

2011年10月-12月

信使

创刊64年

2011年第4期

《教科文组织信使》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有七个语言版本，季刊。

法国，UNESCO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订阅免费电子版：www.unesco.org/zh/courier

出版主任：埃里克·佛尔特

主编：雅斯米娜·萨波瓦

j.sopova@unesco.org

编辑秘书：卡捷琳娜·马可洛娃

k.markelova@unesco.org

编辑：

阿拉伯文：卡来德·阿布·黑杰

中文：王伟英

英文：彼得·科尔斯、艾莉森·麦凯尔维·克莱森、达斯卡·拉纳辛格

法文：菲利普·戴斯达·维扬

西班牙文：阿拉赛丽·奥尔蒂斯·德·乌尔维娜

葡萄牙文：安娜·露西亚·基玛拉里斯

俄文：玛丽娜·亚罗严

法语翻译：

弗朗索瓦·阿尔诺·德米尔、玛丽娜·科尔森、瓦莱丽·布里翁、诺艾米·安东尼

图片：索菲·苏贝尔贝

版面设计：牛津大学基线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教科文组织

咨询和复制权：

+33(0)1 45 68 15 64 k.markelova@unesco.org

文献收集：比鹿·克里斯丁·莫莱尔·瓦斯格

网络平台：克·皮罗·范文勇

实习生：兰德里·鲁金咖穆比

致谢：达尼卡·比杰加克

欢迎非商业性转载。转载时请注明作者、日期和“转载自《教科文组织信使》”字样。

所有文章代表的是作者的意见，并非教科文组织意见。

可以转载版权属于教科文组织的图片，转载时请注明“©教科文组织和摄影师的名字”。如需高分辨率的图片，请和图片库联系：photobank@unesco.org

地图的边界线并不代表教科文组织或联合国对任何国家、领土表示任何看法。



法国造型艺术家本杰明·比尼的系列作品《面对灵魂》。文化间对话。融合当代艺术和原始艺术。



社论 — 伊琳娜·博科娃，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5

人文主义谱写新篇章

人文主义何去何从？ — 桑杰·赛斯 6

有你，故有我 — 迈克·翁耶布奇·埃泽 10

好客之道怎么了？ — 阿斯米娜·卡拉芬达 14

公平和尊严 — 波莱特·迪特朗 16

新的转折点 — 奥利弗·考兹拉瑞克 18

人文主义的穆斯林阶段 — 马哈茂德·侯赛因 22

为了和谐社会 — 刘吉 25

1951年的教科文组织，迈向新人文主义 27

全球化应以人为本 — 米莱尔·德尔马斯·玛蒂
回答雅斯米娜·萨波瓦的提问 28

数字人文主义 — 米拉德·多维希 33

欢迎来到人类世 — 露丝·欧文 34

科学梦 — 米哈尔·迈耶 36

生物伦理学，未知的挑战 — 萨尔瓦多·德·伯杰 39

人类未来的七点建议 — 克里斯多旺·布瓦尔克 41

嘉宾

儿童兵，面临的新生活 — 福里斯特·惠特克
回答卡捷琳娜·马可洛娃的提问 44

书的未来

想象力的特别空间 —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47

身残志不残

普鲁登斯的飞翔 — 罗杰·罗斯·威廉斯向
凯茜·诺兰讲述普鲁登斯的故事 51

里程碑

教科文组织欢迎 53

阿尔苏·阿布拉莫娃、“五月广场祖母协会”、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阿拉萨内·瓦塔拉、布莱斯·孔波雷、阿卜杜拉耶·瓦德、穆罕默德·乌尔德·阿卜杜勒·阿齐兹、赫比·汉考克安吉拉·龚扎雷·辛德、豪尔赫·爱德华兹、罗伯托·托斯卡诺、朱莉娅·克里斯蒂瓦、罗热-保尔·德鲁瓦、阿德拉·科尔蒂娜、维克多·戈麦斯·平、法图·迪奥姆等人士。



本期内容

印度教授桑杰·赛斯在本期杂志的首篇文章（第6页）中宣称：“今天，对人类共性和尊严的主张，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是个迫切的问题。”对于当代人文主义，他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想法，如：质疑单一世界；世界各地不同道德观的共存；普遍正义的需要。尼日利亚裔迈克·翁耶布奇·埃泽（第10页）、希腊的阿斯米娜·卡拉芬达（第14页）和墨西哥的波莱特·迪特朗（第16页）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些想法进行了阐述。

德国哲学家奥利弗·考兹拉瑞克认为新的人文主义正在吸收所有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第18页）。埃及的政治学家和伊斯兰学者马哈茂德·侯赛因说，某些伊斯兰哲学思想是基于人文主义理念的（第22页）。中国教授刘吉认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可以作为新人文主义发展的模式（第25页）。

如果人文主义原则不付诸实践，那它只是一厢情愿的想

法。法国法学家米莱尔·德尔马斯·玛蒂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利用法律的“预想效力”来构建公平的、多元化的、开放的人文主义（第28页）。在论据中，她引用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挑战：气候变化、新的数字技术和生物医学技术。美国的米拉德·多维希（第33页）、新西兰的露丝·欧文（第34页）、以色列的米哈尔·迈耶（第36页）以及阿根廷的萨尔瓦多·德·伯杰（第39页）也就此进行了探讨。

随后，巴西参议员克里斯多旺·布瓦尔克认为新人文主义应该建立在以下七大支柱上：促进全球政治、尊重文化多样性、爱护环境、保证机会均等、促进均衡生产、教育的融合和道德的现代性（第41页）。

本期嘉宾是演员和电影制片人福里斯特·惠特克，最近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他向我们解释了自己为何致力于儿童兵的事业，远离奢华的

好莱坞，来到这荒芜而悲惨的世界（第44页）。

“书的未来”是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最钟爱的一个主题。他的小说《燃烧的佩欣丝》启发了迈克尔·雷德福拍摄电影《邮差》。他预测，各类媒体将继续共存，有结合研究和信息的电子书，也有很适合“非实用想象力”的纸质书籍（第47页）。

为了纪念国际残疾人日（12月3日），我们还在本期杂志中发表对美国导演罗杰·罗斯·威廉斯的访谈。他的电影《普鲁登斯的音乐》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短纪录片奖。他讲述了与津巴布韦年轻女子普鲁登斯相遇的故事。普鲁登斯失去了双腿，但是通过自己的歌声，克服了一系列的困难，包括歧视、贫穷和被家人遗弃等（第51页）。

雅斯米娜·萨波瓦



© Fred de Noyelle/Godong

社论

伊琳娜·博科娃

人文主义是一个古老的承诺，但又总是新的，总是在不断创新。人文项目从古代就出现了，但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它都闪耀着新的光芒。在这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这个词的含义已经有别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不再是当时所指的完美的人、作自己和宇宙的主人等含义。它也超越了后来启蒙思想家们所赋予的含义，因为后者虽然有普遍愿望，视野仍然局限在欧洲中心主义上。

尊重文化多样性是21世纪人文主义的核心要素，这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垄断世界，任何文化都可以为加强人类的共同价值做出贡献。

绿色新政、数字技术和生物医学引起的伦理问题、经济和政治危机等给全球带来挑战，需要我们做出协商一致的对应。今天的人文主义应该为我们共同讨论全球问题设立框架。

除了理论，人文价值必须转化为实践，包括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2000年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是一个极佳的人文项目。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妇女权利和两性平等是优先事项。今天，人文主义开始放下架子，关注女性。

人文价值观是教科文组织的哲学基础，被列入《组织法》，65年以来一直引导着教科文组织，“和平尚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之团结”。

建设一个负责的、团结的世界是一项长期事业，应该把人类所有的创造性力量聚集起来。文化、哲学、科学、

信息技术、法律、国际合作给我们提供了方法。每一天都保护人的尊严不是乌托邦，我们应该遵守人文主义承诺。

和平尚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之团结。

今天的人文主义应该为我们共同讨论全球问题设立框架。

除了理论，人文价值必须转化为实践，包括在人类活动的每一个领域。



© UNESCO/Andrew Wheeler

→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于2010年2月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首届“和平与文化间对话高级小组会议”上发言。2011年3月，高级小组会议再次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召开，主题是“21世纪的新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何去何从？

人类的共性，和使得虽有分歧但人人平等这一愿望合法化是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仅仅是在单一理性的世界里研究，我们今天则应该在不同道德愿景的交集里寻求。

桑杰·赛斯

对人文主义的各种理解中有一种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主张或直观，它认为所有人拥有一些共同的人性本质，而这决定了人人平等享有尊严和尊重的权利。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能把人文主义与其它学说和理解区分开来，比如宗教学说就认为所有人共享一种共性（一个不朽的灵魂等），并因此而获得尊重。

在历史上，人文主义真正得以与许多其它关于人类尊严和价值的主张区分开来的是其主张采用的特有形式，尤其是它的两个支持或支撑论点；正是由于这两个论点肯定了人的平等和尊严，才赋予了这一主张明显的“人文主义者”特色。这两个论点是：首先，主张人的价值独立于神（或神灵们）存在，更通俗地来说，即“人”取代神作为万物的尺度；第二，人的共性不仅由合理性组成，存在于合理性，而且只能通过这唯一的合理性被发现。

因此，可以这样理解，人文主义不是仅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现象，它在启蒙运动时期得到登峰造极的发展，形成了关于人性普遍和理性为唯一尺度的思想。

在本文中，我提出这个问题：从人类学角度理解世界，和寻求唯一的合理性，是否最好地保证了对人类共性与价值的主张？简而言之，人文主义是否是实现人类共性及尊严主张愿望的最佳方式？

人是宇宙的中心

爱德华·赛义德¹宣称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世俗观，即历史世界是由世间男女，而不是神创造的，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因此，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一种哲学人类学，它把人放在中心位置，而降低了神（或神灵们）的作用（虽然神的作用并不一定完全消除）。

曾经，人们用神的宗旨和行为来解释人的世界；对人文主义而言，要了解人类的神灵，首先要了解人，因为神是人在头脑中通过幻想创造的。

如果说由于人是意义和目的的创造者，而以人为中心涉及神（或神灵们）曾被赋予的角色地位的下降，其实它还涉及了人世与非人世的分割和区分。有两个世界存在着，一个由客观过程和规律构成，另一个由人类的意图和意义构成。

自然不是一个具有目的和意义的领域，因此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即是对客观世界及塑造这个世界的法律性力量的了解；对历史或文化世界的认识，则是关于目的和意义的知识，因为历史世界是人类留下的痕迹中意义和目的最明显的部分。自然知识和自然科学的保存，可以使人类掌握自然力量；而历史世界的知识和对人类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保护，使得人类认识自我。

人文主义取代了单一世界的观点，在贯穿了意义和目的的单一世界中，自



↓法国画家、雕塑家理查德·德克萨尔的作品《神圣理论环》。转载得到作者友情授权。
www.richardtexier.com

环境危机问题的突然爆发，使得人们质疑人类的绝对特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清晰界限，而这两者是人文主义的经典特征。

然的目的和设计预示并反映在社会世界里，而在两个世界中，其中一个世界缺乏意义和目的，而另一个世界由人类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赋予的意义和目的构成。

对这些假设的批评者一直不少，包括哈曼²、祈克果³、阿多诺⁴、霍克海默⁵和海德格尔⁶。在非西方世界，有多少人接受并称颂西方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就有多少人批评这种声称弘扬人类实际上却经常贬低人类的“文明”，比如，甘地圣雄⁷、塞泽尔⁸和法农⁹。尽管如此，这种哲学人类学衍生出的学说对其起源的阐述使得它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这种阐述歌颂其传承世系。

然而，我认为，由于情况有所改变，需要对人文主义的这种定义加以批判性地复议。首先改变的是，由于环境危机问题的突然爆发，使得人们质疑人类的绝对特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清晰界限，而这两者是人文主义的经典特征



© Archive SOMOGY

1. 爱德华·赛义德 (1935-2003)，巴勒斯坦裔美国文学理论家和后殖民研究理论创始人。著有《东方学》(1978)和《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2004)。
2. 约翰·乔格·哈曼 (1730-1788)，德国哲学家，是伊曼努尔·康德的朋友和学说上的对手。他深信，是信仰和信念，而不是知识，决定了人的行动。
3. 索伦·祈克果 (又译为克尔凯戈尔、克尔凯郭尔、基尔克果) (1813-1855)，丹麦基督教哲学家，被称为“存在主义之父”。
4. 西奥多·阿多诺 (1903-1969)，德国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与霍克海默和其他人形成了社会理论和哲学的法兰克福学派。
5. 马克斯·霍克海默 (1895-1973)，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最著名的是其“批判理论”，结合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政治哲学与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分析。他与阿多诺合著了《启蒙辩证法》(1947年)。
6. 马丁·海德格尔 (1889-1976)，德国哲学家，因其从现象学角度对“存在”问题的探索以及他对哲学人文主义的批判而闻名。阅读：《关于科技的问题及其他散文》，哈柏火炬丛书，1977年；《基本著作》中《关于人文主义的信》一文，1993年。
7. 圣雄甘地 [1869-1948]，印度的政治和思想领袖及国父。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理念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公民权利和自由运动。
8. 艾梅·塞泽尔 (1913-2008)，法国马提尼克岛诗人，黑人精神运动的创始人之一。阅读：《殖民主义论述》，每月评论出版社，2000年。
9. 弗朗茨·法农 (1925-1961)，法国马提尼克岛精神科医生，积极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斗争。以非殖民化问题思想家闻名。阅读：《地球上受苦受难的人们》，格罗夫出版社，1963年。

(见第34-35页)。显然，我们把人类特权化，不仅引起了对人类持续生命所需条件的掠夺，而且使得人类创造的世界与独立于人世存在的另一世界之间的界限崩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物种大灭绝，人类已成为地质作用者，而不再（像以前一样）是单纯的生物作用者。

启蒙运动项目

如果说人类学（以及因此产生的自然与社会的分别）是人文主义的一个定义元素，那么其另一定义元素就是认为人的共性存在于并且只能通过一个唯一的合理性被发现的信念。启蒙运动的核心就是建立这一信念的项目。

康德¹⁰在他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启蒙”一词给出了他著名的定义，即启蒙是人使用自己的理性走向成熟的过程。但是，如果前现代概念中的那个道德有序、宗旨明确的宇宙已经“解除了魔咒”（用韦伯¹¹后来的话说）；如果传统和习俗似乎不再是理性的来源，事实上，不再合理；如果休谟的怀疑论挑战¹²提出有多少人就存在着多少种理性的可能；那么这个理性到底是什么理性，以及，是谁的理性？

这一难题最经得住考验的答案是康德提供的。它最主要的力量在于康德称之为“先验”的论点。康德没有“教条式”地断言某些命题的正确，或试图从经验主义立场找到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合理原则，相反，他询问我们人类是什么样的存在，才会从一开始就拥有认知力和感知力。这个先验性的问题使康德推导出理性的普遍性，理性并非从人类的不同经验中获得，但它是我们能够从一开始就获得任何经验的基础。康德成功地提出了关于普遍理性的一个有力论点，因为尽管人类的经验及关于道德和美的概念千差万别，普遍理性是人类拥有任何经验、道德或美感的前提。

康德以及更广泛的启蒙运动所阐述并捍卫的现代知识，现在可以声称获得了验证或证明，从而揭示出，所有之前的知识只是推测和教条。当然，这种不因文化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唯一理性，证明所有人类，不管他们存在怎样的区别，是被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康德以及更广泛的启蒙运动所阐述并捍卫的现代知识，现在可以声称获得了验证或证明，从而揭示出，所有之前的知识只是推测和教条。当然，这种不因文化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唯一理性，证明所有人类，不管他们存在怎样的区别，是被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当代试图拯救或挽回启蒙运动项目最深刻的努力，在承认理性与兴趣、文化和权力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分割的同时，必须承认这一点，因为其最终回归到了康德的理论，证明了康德提出的这一论点的活力。毋庸置疑，对这些说法的批评与康德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传人对他的批评类似，他们批评这些证明预先假定了需要证明什么。

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¹³的例子尤其具有启发意义。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和一些后续著作中，依据康德的理论发展了正义论（见第16-18页），即正义建立在绝大多数人承认的正当合理的几个原则基础上。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他承认，他的正义论和对自由主义的辩护，预先设定了某种公共政治文化，即在欧洲的宗教战争之中因政教分离等原因形成的公共政治文化。因此，他后期理论的宗旨是对西方公认的自由正义，展开务实有序的辩护，而这种正义不可被冒充为“普遍”正义。

罗尔斯勉强作出的“让步”却成为了他人对他的指控，这些人指责说，理性不是没有固定位置普遍存在的，而是属于欧洲的。我们学会的所谓理性不是这样的合理性，而是一种从历史和文化上建设和诠释世界的特定方式。而且，把这一“欧洲理性”传统当作通用理论，是一直以来殖民主义的谎言和辩护理由的根本。用普遍理性只被自己拥有这样的信念武装起来，欧洲坦然地继续其殖民征服，使用的主要借口不再是为异教徒带去上帝真言，而是为愚昧带去启蒙运动和文明。他们遭遇的不是世界其它形式的理性传统和存在方式，而是

10.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现代哲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是1784年发表在《柏林月刊》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11.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12. 大卫·休谟[1711-1776]，西方哲学史及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尤其以其哲学的经验主义和怀疑论著称。

13. 约翰·罗尔斯[1921-2002]，政治哲学家。他所著的《正义论》（1971年）一书，被视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著作之一。引用的作品：《哲学与公共事务》（1995年）中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不是形而上学》一文，《政治自由主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

非理性。殖民主义实施的或随之而来的体制和做法，被认为是在教育殖民地人民，使得他们有一天也可能发育成熟，从而能够参与运用欧洲带给他们的礼物——“理性”。

为了避免出现任何误解，我要说明，我不是在暗示现代欧洲的精神和文化传统是唯一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所有其它传统都是错误的传统，或是唯一试图强加意愿于其它传统的传统。傲慢或教条主义不是摩登时代或欧洲垄断的东西。我所说的是，启蒙运动的遗产——欧洲关于其理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念——使得欧洲征服和统治其它地方成为可能，不是因为其自称优于其它的传统，而是它压根就没有把自己看作一种传统。这是一种没有建立在真实历史社会的理想和做法基础上，不仅号称自己正确，而且宣称正宗从理性本身推导而出的认知。

但是，在非殖民化之后的时代，关于人类的共性以及因此而允许我们确立的尊严和尊重，既不存在于唯一理性，也不是由唯一理性发现的事实，应昭然若揭了。所有这些无论有意或无意的尝试，都以“人”取代“欧洲”或“西方”而告终。唯一理性的概念，虽然深深植根于西方文化和思想，无法持续，需要重新审慎地研究。

开辟新道路

本文开篇我就表示，人文主义主张，人类虽然存在许多的差异，但拥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因此，所有人应被赋予同样的尊重和尊严；

© François-Xavier Dubois



而这建筑在两个支持论点/推定上。其一是哲学人类学，它“发现”意义和价值的来源是人，而不是神，它还发现自然领域是一种没有意义和目的，惰性的客体，受人类的认知探索和操纵。其二是关于人的共性对应唯一理性的推定。

接着，我论述了这两个论点或推定都站不住脚；它们从来不是正确的，其不正确性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这些论点或推定不是终于获得揭示的“真理”，而是解释和构造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它们一直以来是许多人类成就的源泉，但也造成了巨大的代价，在今天尤其明显，人类进步的代价是对人类生活根本条件的掠夺；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正在崩塌；而且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类的共性既不存在于唯一理性，也不因对从人类特有的个性差别中抽象出的唯一理性的追寻而被发现。

今天，对人类共性和尊严的主张，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是个迫切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一种主张，似乎在一定意义上，可当作人文主义的核心。我们不可否认人文主义，但需要对其加以重新发现和解释。我的建议是，经过重新诠释的切实可行的人文主义应该是这样的：关于人类共性和尊严的道德直觉，不再置于不可靠的人类中心说或可疑的普遍理性的主张之上。我进一步建议，这样的诠释应是不同文明之间、不同道德角度对话的产物，而不是宣称，（现代西方的）这种道德观才是正确的道德观。■

桑杰·赛斯（印度），曾在（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和（日本）东京等地担任教职或研究职务，2007年加入（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担任教授、政治系主任兼后殖民时期研究中心联合主任。

← 法国雕塑家理查德·德克萨尔的作品《单一世界》。转载得到作者友情授权。

www.richardtexier.com

有你，故有我

对于非洲说班图语国家的许多人而言，友邦图/波图这个词概括了一个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成员应具有的所有素质。但这个词也被非洲问题研究学者用来批判殖民主义学说，甚至形成了南非新民主构建基础的一种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



如果有人问（非洲南部和东部）哈拉雷、约翰内斯堡、卢萨卡或利隆圭街上的人们对“友邦图/波图”（音译）这一词语的理解，街人可能会列举出社会对一个人所期待的种种美德，如同同情心、慷慨、诚实、大度、同理心、理解、宽恕和分享能力等。事实上，友邦图/波图（或在不同班图语群中当地使用的同义词）¹被认为正是“人”或“人格”的定义。但友邦图/波图这个词在这片地区的社会中所涵盖的意义更广，它

形成了社群伦理的基础、身份论述的基础、甚至萌芽中的泛非思想的基础。

但是，就当代非洲问题的讨论而言，对友邦图/波图的最佳理解是，它是对殖民主义逻辑——企图通过殖民化对非西方文化“人性化”或“文明化”的过程——的一种批判。殖民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居高临下的表述，通过“人性化”或“文明化”非西方人民的借口蓬勃发展。这一虚假人文主义学说，作为种族主义者资本主义培育的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²，结果成为了非洲殖民实践的基石。

种族主义者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一个人的种族决定了他或她的人生选择或潜力，比如，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与什么样的人结婚、上什么样的学校，等等。这一理论对南非历史的影响可以从许多旨在遏制黑人潜力的严酷法律上看出。该体制产生的这类法律有：1913年颁布的禁止黑人从南非购买土地的《土地法》、1918年的《有色人种排斥法案》、1953年取消了非洲历史教学的《班图人教育法》、给了白人就业优先权的《职业保留法》，以及早在1907年就开始实施的，限制黑人运动、迫使他们成为纯粹劳动力的各种种族隔离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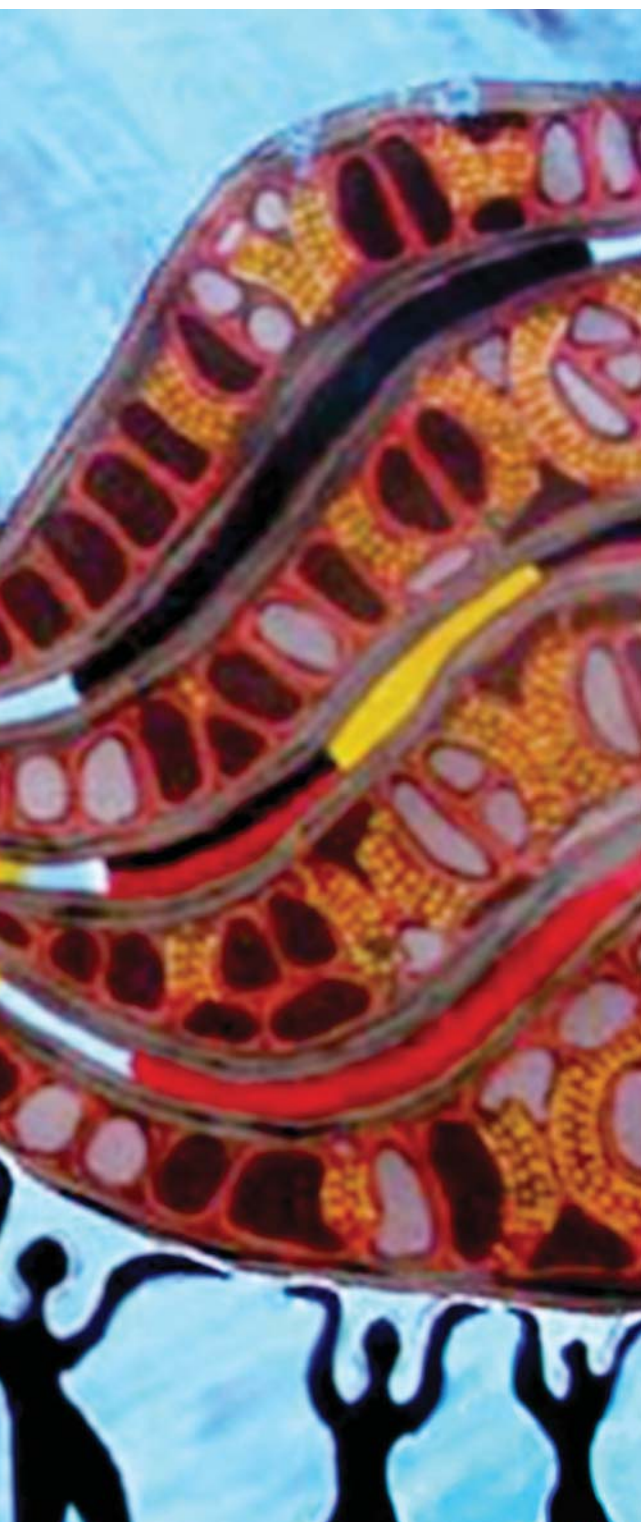
早在1858年，《南非波尔宪法》已经取消了国家或教会事务上黑人和白人之间任何形式的平等。普遍的说法是，强迫劳动是由上帝判定并赋予白色人种的一种神圣特权，使其可以声称对黑人统治的权威。正如在1897年8月，当时南非共和国的总统保罗·克鲁格，告诉他的人民委员会所说的那样，“我们的宪法不需要平等，平等是有悖圣经的，因为社会阶层是由上帝确定的”。后来，他还在回忆录中写道：“……那里只有少数白人男子，为了使成千上万的黑人遵守秩序，严厉是至关重要的。黑人们必须得到教导，让他们明白自己是排在第二位的，属于必须服从和学习的下级阶层。”

这种心态后来成为南非殖民地历史的政治蓝图，曾是新南非获得国家主权

殖民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居高临下的表述，通过“人性化”或“文明化”非西方人民的借口蓬勃发展。这一虚假人文主义学说，作为种族主义者资本主义培育的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果成为了非洲殖民实践的基石。

1. 友邦图/波图一词来自于南部非洲、东部非洲、（西部非洲的一些地区）和中部非洲的人们，即通常简称为班图语群的人们，衍生于他们方言中指代“人”的一种模式。绍纳语中“人”的单数是munhu，复数是vanhu。祖鲁语，科萨语和恩德贝勒语中“人”的单数是umuntu，复数是abantu。索托语和茨瓦纳语中“人”的单数是muthu，复数是bathu。

2. 查尔斯·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衍生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强国在道德上拥有征服和主宰弱国的权威，或者，甚至可说是义务。这不过是事物的自然秩序。



© khanyiselaong

的基础。如果说，南非殖民地国家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那么，新民主独立国家的思想基础应该是什么？这就是友邦图/波图的用武之地。

友邦图/波图作为一个公共论述话题，获得了公众的认可，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洲人文主义，可以用以下的这些班图语格言概括，如“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他人的认可”。换句话说，人通过他或她与他人的关系实现其人性。但这种理解并不会生成压迫模式，不会使个人在维持与“他人”关系的尝试中失去自主权。

许多非洲问题研究学者把友邦图/波图形容为一种任意的社群伦理，这种理论认为个人利益和福利的必要性只是次要的。但是，对与他人的关系这种条件的一种批判性解读可能会建议，一个人的人性在与他人的关系远近，特性和差异碰撞的过程中才会得到蓬勃发展。实现我们彼此具有的主观天赋（人性），激发了一种无条件去观察和利用他人特性和差异的愿望，不是把它们视作一种威胁，而是当作对自己的人性的一种补充。非洲基督教哲学家J·S·姆比蒂现在被作为经典的那句话，即“我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因为我们存在，所以我存在”，抓住了这种因关系远近而形成的主观理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姆比蒂赞成把社群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对人的主观性的肯定。但是，我不赞同这种社会优先于个人的思想。这两者没有哪个更优先的问题。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应是一种主观上的平等，我们对双方不同但平等人性的相互承认，使得人与人之间无条件的宽容，和把丰富自己人性的“他人”视为内在馈赠并加以赞赏成为可能。

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

在南非的当代历史上，对友邦图主要有三种理解。

首先是一种假定，认为友邦图仅仅是非洲学者捣鼓出来的一种不合时宜的观点。这里友邦图起到取代殖民主

义逻辑的替代表叙的功能，是关于身份的一种绝望的论述——一种小题大作的道德观，使我们得以处理现代性和全球化带来的创伤。这个论点是，由于我们不能非常肯定地把友邦图鉴定为真实的历史文化，它仍然只是一种以陌生形式存在的人为创造的论述。因其“人造”性，友邦图友邦图或多或少是一个“空洞的概念”，非洲问题研究学者用一种“进口”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其加以灵活引导，从而形成其自身的身份。从不同的非洲文化传统汲取关于“人”的价值观的证据，加以揉合，然后成了友邦图所代表的含义。因此，友邦图被普遍认为是具有非洲普遍性的一种价值观，无论其应用的社会有怎样的实际历史背景。但是，友邦图并不需要具有同质的历史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非洲价值观。而且，即使缺乏历史的真实性，也不能剥夺友邦图的标准合法性。

第二种推测是，友邦图具有被用于政治目的的意识形态的特性，从其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及在南非的宪法草案初稿中的应用可以看出这一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可以被当作“魔杖”，来处理每一个突发的社会危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也可能被滥用，不再是一种道德价值观，而成为一种标价的商品，被用作建立一种正面的企业或品牌形象，如“友邦图安全”、“友邦图餐厅”、“友邦图 Linux操作系统”、“友邦图可乐”等等。

第三种理解是一种历史观，其中友邦图/波图被置于其出现的历史背景下考虑。因其历史性，它也获得了情感和道德上的合法性，因为在友邦图/波图价值观被唤醒的社会，它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实践内在的一种美德。

那么，问题是，友邦图/波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解释，是否排除了所有创造性历史性的可能性？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友邦图/波图在南非的政治史上（即使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背景，是一个国家尝试配置与其新兴国家形象一致的政治继承理论的情况。不论其可疑的起源，友邦图/波图成为所有南非人都愿意认可的公共美德的刹那，就

3. 关于非洲史学是不论非洲地域的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和不同传统，认为它是单一的历史叙述的想法。

4. 创造性历史性认为历史既不凝固于过去，也不是单纯的事件年表。好的历史允许多重影响和背景。



种族隔离期间的南非日常生活一景。



1970年1月，南非开普敦一个仅供白人游玩的沙滩。

成就了其历史性。尽管缺乏真实的历史渊源（如没有书面记录，也不是一种体现细微差别的文化信条），其公信力不受影响。

友邦图被理解为新民族意识的表叙，不仅提供了一种取代旧政治秩序的

情感上的合法性；还赋予了新的政治秩序一种认同感和政治目的。旧秩序在歧视和区别对待的公民概念基础上获得发展，新政权通过试着建立以包容和公民美德为发展基础的民主公民的概念来获得合法性。但新的制度必须建立在排除以往压迫体系的基础上，并采用一套建立在人性和无条件的人格尊严概念基础上的价值观系统。在这一点上，友邦图“概念”承担了锻造新的国家认同感的道德角色。

对把友邦图用作一种统一意识形态的批评者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没有连贯性的、人为创造的、没有历史的道德。但意识形态并不早于历史出现；它们应某一历史时代的具体问题而出现，挑战、矫正或取代某种思维定势（或旧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看友邦图是否可以被改造成一种意识形态，目光主要集中在其规范的本质，以及它的缺乏历史性是否会始终影响其获得实质内容。

与此同时，友邦图通过人类美德的实践成为Munhu, Umuntu或Muntu（等），这种实践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依附背景存在的。然而，通过引导产生道德实践——这些实践被所有南非人，不论其社会文化背景，认定为好的道德实践，友邦图已经能够超越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在对和解、宽恕、理解和友邦图，而不是分裂、怨恨、复仇和牺牲（见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文件）的需求守卫下，这种评价标准将成为建设新南非的灵感。这些大多数南非人追求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价值观，为新的国家形象铺平了道路。而这赋予了友邦图道德上的权威。■



© UNESCO/McKenna Durrell



© United Nation Photo

迈克·翁耶布奇·埃泽是（美国）斯坦福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的尼日利亚裔美国访问研究学者。他持有（德国）维滕/黑尔德克私立大学思想史博士学位，曾在奥格斯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非洲研究。他是《当代非洲历史政治》和《当代南非思想史》（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0年）两书的作者。



© Marie C. Cambon

好客之道

怎么了？

一系列的危机持续发生，难民不断增加，这些都改变了当今世界社会文化的前景。为了应对这些变革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新的人文主义，满足由不同文化构成的团体的需求。这种需求会不断迅速地增长。

阿斯米娜·卡拉芬达

两次世界大战、集中营、血汗工厂和其它全球资本主义机构，无论它们在性质上有什么差异，这些事件都描述了20世纪的一段黑暗史。反殖民主义和内战的牺牲者也必须考虑在内。一旦哲学家的人文主义谈话转变为特定人群和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即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在哲学家的启蒙中就会潜藏着危害，这些灰暗的历史可以验证这一点。

人文主义的承诺与它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交易中的辅助角色不同，这引发了严厉的人文主义批判，以及其在道德和政治这两方面相冲突的理念。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达到顶峰。这次人文主义体系的瓦解无可争议，是广泛的¹。这种摧毁增强了重建人文主义的需求，这些需求是从那些“最近才被当人来对待”²的那些人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是从他们各自的团体和文化的角度出发。这些团体通常是流散的，多语言的，跨文化的。

因为人文主义不再是欧洲君主制和帝国的产物，这些国家的殖民计划是其启蒙理想中意识形态的必要的基础；因为人文主义不仅仅以单一的文化和语言的构造定义一个国家，“人文主义恢复后，演化成新的人文主义，同早期的人文主义一样的是：对于人类，普遍存在的不是合理性，而是生命是有限的现实，不是思考的能力，而是遇到痛苦的脆弱性。”³

← 2009年，法国，支持无证工人的游行。

人文主义是种必要

难民和无国籍的人不断增加，经济和政治危机持续不断，原教旨主义者、排外者和新的种族主义者也在增加，随后发生群众性的暴乱。这些让民主、人文主义的出现成为需求的一部分。巴基斯坦裔美国人爱德华·赛德（1935-2003）说：“灰暗的历史验证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个人无法推断出：根据神或者强大力量的准则，人文主义是向前发展的，非人为的。”⁴

世界充满了美好之物，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类更出色。

——安蒂冈尼·苏弗克里兹

只有当很多不同的人在不改变特性的情况下看待事物时，聚集在周围的人们才知道自己在多样性中看到了特性，即真实、可信的世界本来面貌。

——汉娜·阿伦特

↓ 2003年，黎巴嫩一所高中“对话、容忍、和平”的学习演习。

赛德分析了西方人文主义在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观，并以此著称。他还研究了西方人文主义极端的意识形态对非西方文化的影响。赛德的这些见解出自他死后出版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批判》一书中，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对于赛德来说，与其它人一样，人文主义是“运用个人的语言能力，以便理解、重新解释并尽力解决历史上的语言、其它语言和其它历史产物的问题，”……“人文主义不是用于巩固和证实我们通常的认知和感受，而是用于质疑、颠覆和重新建造。这是当我们面对‘商品化’、包装，以及没有争议与批评的法规时，采取的一种方式”。

目前需要的是了解“复杂的历史”，学会记住那些拥护者所遗忘的事情，他们以前忽略、排斥的文化是当今时代的紧迫任务。如果二十世纪是“意识放逐的年代，”正如赛德在《文化和帝国主义》⁵中断言的，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的年代。

跨文化的社会

古希腊人相信人类与其它物种相比，独特之处是人类居住在有法律规范的社会中，换句话说是在居住在城邦国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四世纪）阐明了

人类是居住在城市中的“政治动物”。接近我们时代的原籍德国的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把现代难民描述为最真实的“政治动物”，但他们失去了城邦。

当今，政治和经济危机席卷了全球，不仅加速了难民的人数，也剥夺了那些公民长期拥有的工作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公民现在成为一个城邦的公民，被剥夺了权利。最近在马德里、开罗和雅典的广场，发生群众暴动事件，无国家的难民遇到城邦的公民。即使他们在需求上存在差异，但是共同主张的民主理想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的民主理想是把人放在第一位，认为人是最重要的。尽管无国家的难民

1. 朱迪斯·巴特勒、欧内斯特·拉克罗、萨瓦·吉吉合著《偶然性、领导权、普遍性》，维索公司，2000年。
2. 琼·阿尼摩—阿多，《后西方人文主义之最近才被当做人来对待》。阿斯米娜·卡拉芬达与妮娜·莫干合著《爱德华·赛德和雅克·德里达：重荅人文主义和全球混合》，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250—274。
3. 霍尼格，邦妮，《安提戈涅的两部法律：希腊悲剧和政治人文主义》，新文学史，41.1（2010）：1—33。
4. 爱德华·赛德，《人文主义和民主批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爱德华·赛德，《文化和帝国主义》，最佳书业，1993年。



公平

和邦国的公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不同，他们都要求建立一个新的邦国。在这新的邦国中，语言、传统和神话的多样性构成了每日的生活。而这新的城邦要存活下来，需要转变并且引入外来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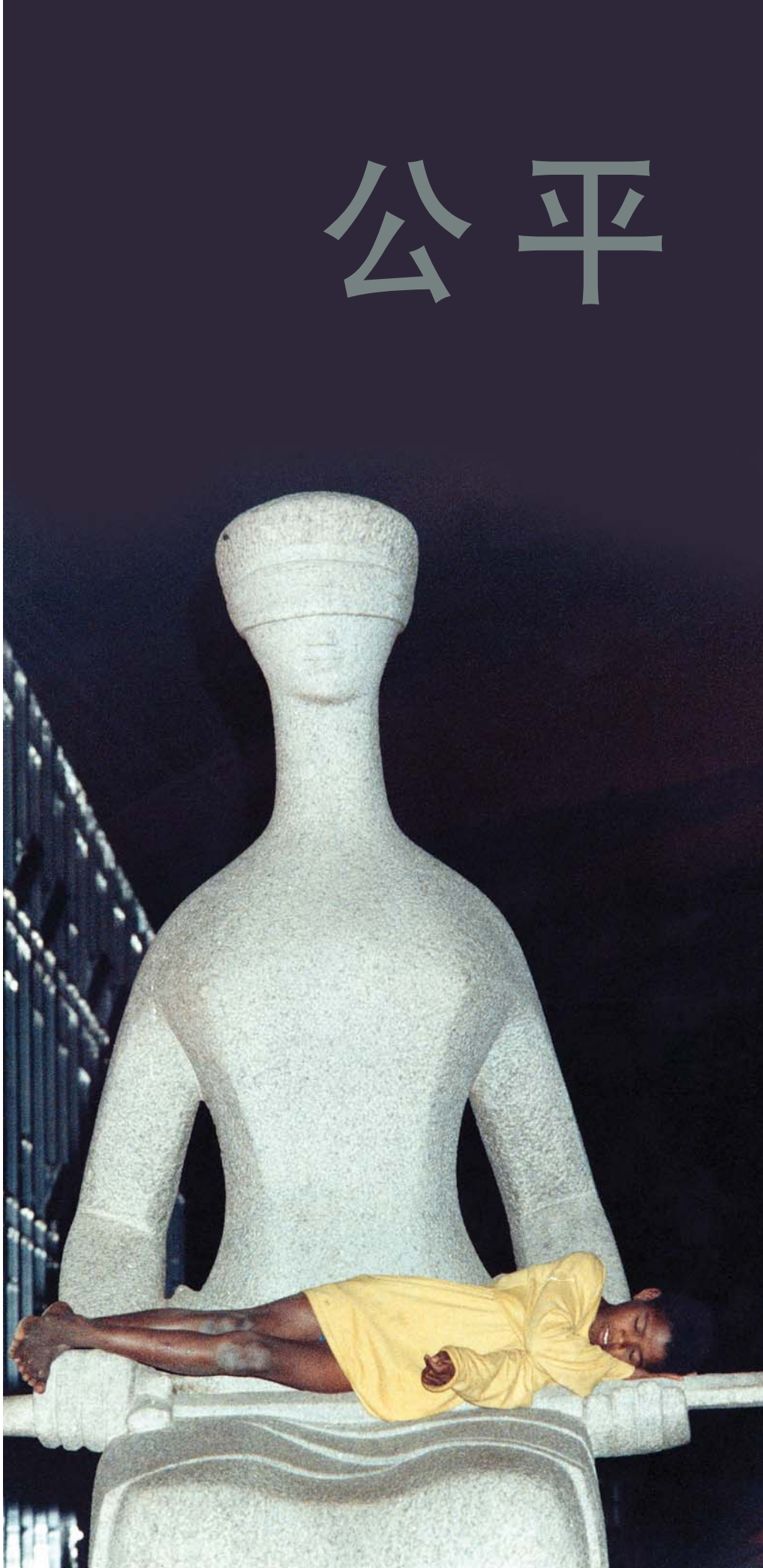
跨文化的情况发生在个体和政治层面，从内部改变了城邦。但是对于在社会和政治层面被认为是独特而平等的人类来说，教育改革必不可少，以便让跨文化的学习能够蓬勃发展起来。用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话来说，对那些认为“好客是应当的”的外国人，应该持久存在善待他们的法规。⁶

建立这样的人文主义，热情对待外国人，重建人文主义法规和谈话，商讨完全不同的人类环境和政治环境是当今人类的任务。据美国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说，这个任务“也许是我们找到这样的人类：我们并没有期望遇到他，他很脆弱，无力判断。”⁷换句话说，就是应该想想这些人——这些总是被威胁、总是处于危险中的人，他们注视着我们的面庞，好像是对全球范围内正义的一份公开和持久的请柬。■

阿斯米娜·卡拉芬达，对比文学博士，在雅典大学教书，专攻后殖民主义文学和理论，与妮娜·莫干合著《爱德华·赛德和雅克·德里达：重荅人文主义和全球混合》，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

6. 雅克·德里达，《好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朱迪斯·巴特勒，《充满变数的生活》、《哀痛和暴力的力量》，伦敦&纽约，维索公司，2004年。



和 尊严

世界上有几亿人在经受苦难和贫困，这种状况需要哲学方面的指导思想，促使公平分配。这个理论支持，在个人尊严、自主权、个人责任受到侵犯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

波莱特·迪特朗

尽管二十世纪有很多条约、协议和国际峰会，尽管当代社会有意愿在世界范围内与贫困斗争、减少不平等，但是距离实现减少贫困的目标仍很遥远，贫困仍然在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8年，有14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每人生活费少于1.25美元。目前地球上有着近70亿人口，也就是说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没有足够的资源，达到基本需求。这些人受到非人道的待遇，同时游离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之外。

在道德哲学范畴内，有一个理论直接涉及到贫困和不平等，这就是“公平分配”。当掌管物资的原则不再尊重个人权力、价值、需求的时候，这个理论可以通过监督体系来修正这些原则。

这个理论的各个层面都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即人类支持一种分配政策，而非另一种。

← 1998年，巴西利亚，巴西最高法院前面一景。

© UNESCO/Ivaldo Alves

例如，有一种理念，认为最贫困的人是被动软弱的，他们不能为自己设立目标，确定自己的需求。这种理念，促使专制政策的产生。这些被动软弱的人只得到了一点分配的利益，但是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只具备基本权利，更多的决定权被他人所取代了。这个现象经常在很多国家发生。例如，在墨西哥，社会房屋计划的一部分是，政府决定为每个房子都配置一个洗衣间。但是女人习惯了在河边洗衣服，他们把洗衣间变成了家庭的宗教活动场地，祭品堵塞了水管。

但是，我们考虑个体不仅仅要考虑到方法，也要考虑到结果，以后的分配政策，必须促进更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从而让受益人努力工作，以达到人生目标。这个想法是基于人类是有自主权的、值得尊敬的个体，可以自由选择。

对“公平分配”的另一种说法是，个人在本质上是经济个体，寻求“收入最大化”，也就是大力提升收入和购买力。这个理论以货币单位衡量成本，以单位收入衡量结果。这个理论的支持者，推动让最贫困阶层增加收入的政策，从而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减轻贫困。在这种情况下，优先权取决于性价比。例如，在美国，医疗方面的决策偏向于切除扁桃体的手术，而不是血液肾透析，尽管透析病人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这个决定意味着以最小的成本覆盖更多的人群。

但是，我们考虑个体不仅仅要考虑到方法，也要考虑到结果，以后的分配政策，必须促进更好的经济社会环境，从而让受益人努力工作，以达到人生目标。这个想法是基于人类是有自主权的、值得尊敬的个体，可以自由选择。毫无疑问，这是“公平分配”提出的最合乎道德的、最人性的立场。墨西哥的“进步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并没有直接提供食物救济，而是推广教育，传播资讯，以便提升群众在健康和营养方面的知识。另外，给家庭分配补贴，让他们自由决定怎样使用这笔钱。

全球性的公平

按当前的情况，公平分配应该选择个人还是社团作为分配的对象？这个问题把自由主义思想家分成了两派，一派采取平等主义的立场，另一派则提倡社区主义理论。后者认为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政策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事实：人类不是孤立生活的，是文化或社会群体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些定义了人类的身份。因此，对于提倡社区主义社会的理论家来说，重要的是要把每个团体的历史和特质考虑进去。因为每个

社会团体都发展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再分配和消费的特有形式。

前者，即以个人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支持者则坚持团体之间本质上是不一致的，如果不给予那些形成团体的个体以一定的优先权，很难达到分配的要求的。

但是，还有第三种公平分配方式，即“全球化公平分配”。这个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国家概念，聚焦于全球范围内由贫困和不平等引发的问题上。全球化公平的理论家支持的是，国际机构体系的主要职责是在世界范围内补偿那些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人。在这一方面，不限于团体的成员或某个特定国家的公民。

从人道主义的视角来看，个体、社区主义、全球化这三个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实施公平分配政策。把个人看作是值得尊敬的个体，能够行使他们的自主权。墨西哥政府使用鼓励措施对抗贫困，这是政策的一部分。人们表达他们的需求，选择看起来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这可以帮助加强受益者的责任感，提高他们做决策的能力。

如果这个哲学理念的基石是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上，这个政策是平等的，尊重权利的，并且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就可以说“公平分配”是符合人道主义价值的。■

波莱特·迪特朗，墨西哥哲学家和研究员，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哲学研究院成员，公平分配和公共政策领域的专家。出版的著作有《贫困：一种哲学理念》（2002年）。

新的 转折点

最近，社会和人文科学转变的重点，不在寻找生物本质上的普遍性，而是在承认人类差异的同时，寻找世界上所有人类的共性。新观点认为，普遍性的概念和价值观已经存在于所有文化中，并不需要发明一种普遍适用的人文主义文化，或者把这种文化强加于其它文化。新观点还承认，这个世界到处有人经历同样的不人道经验。这应引起我们的思考：尊严的、有人道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奥利弗·考兹拉瑞克

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都开始修改议程。它们不再寻求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人们日益认为这等同于极权主义野心——而开始更加注重认同文化、种族和性别上的差异和身份。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活动，演绎了对文化在人类生活中所发挥的深刻作用的重新评估，学生的抗议活动也许是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的标志。同时，理智和学术上的辩论开始对文化更感兴趣，并发起了在今天被广泛认可的，社会和人文科学上的“文化转向”¹。

这一“文化转向”强化并传播了若干价值观，包括文化多元性和这样一种意识：在现代世界，重要的是在抗拒再次把这种多元性降低到一种人为的、抽象的、由一派利益主导的唯一性诱惑的同时，体现各种独特文

化和生活形式的并存。这让我们得以窥视“文化转向”的关键潜力。与二战结束后头几十年中喧嚣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宣扬的思想——即所有人类文化都正在朝着同一进化的最终目标（终极目的）推进的思想——相反，文化转向抢救了一种思想，即文明和文化的进程，以及它们的结果，不按照一条预先设定的、合乎逻辑的路径发展。

但是，无论文化转向有多重要，我还相信，文化主义已经引起了不仅危险，而且也是不正确的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氛围。这些地方的错误观点，尽管显而易见，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忽略了。其中最明显的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不同的文化不可衡量，也不可调和，而事实上，它们共有许多相连和相似之处。

德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夫·安特威勒的著作，对不同文化共享了多少“规范、价值观和理想”作出了洋洋洒洒的叙述²。



© Janaka Dharmasena

吸取传统人文主义的教训

反而，我们必须进行文化间的对话，讨论有尊严的生活对一个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正是通过文化，从文化的内涵中学会怎样把自己定位为人类。通过研究和比较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有多少共同之处。“人文主义转向”和“文化转向”必须互为补充。这意味着，人文主义必须跨越文化，并参与对话。

所有文化和文明都具有人文主义传统。但“人文主义转向”不是回归传统形式的人文主义。传统形式的人文主义问题之一是，它们由历史经验启发形成，而这些经验已经过时，不适合我们了。例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不能脱离挑战教会权威的愿望。

另一个问题是，许多传统形式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联系过于密切。这里可再次引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一个例子。当时的人文主义的兴趣在于按照“宇宙的性质”发现“人的本性”。这种自然主义的传统至今仍然非常活跃，以各种科学思想的形式存在，这些思想往往把“人”的条件归纳到生物学上。与自然主义相反，新人文主义必须理解一点，即我们是在文化中，通过文化而成为人的。

但是，若简单地把在许多不同的文化遗产中可见的传统形式人文主义遗忘，同样是错误的。正是在这些传统中，我们能够找到明确的证据，证明人类共享着，并一直共享着，一些关于人意味什么的非常重要的思想。但是，学习其它人文主义传统并不只是意味着再次确认我们已经知

↑15世纪末，达芬奇的作品《维特鲁威的人体比例研究》。斯里兰卡摄影师加纳卡·达玛塞纳对其进行了处理。

安特威勒认为，我们之所以经常看不到这些相似之处，是因为我们不想看到。不过，他也表示，只要我们去寻找，就会发现相似之处。运用正确的态度，安特威勒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能够在“西方”思想，而且在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中看到对人权的表达。安特威勒的主要论点是，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思想——该理论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具有深刻的不可衡量性——是错误的。

安特威勒的想法似乎触到了痛处。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种种

迹象，显示文化主义正逐渐失去其能量。许多作者感到需要寻找跨越文化的规范性趋势，但这种需要没有强烈到否定文化差异的现实，以至于反对文化相对主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人类得以区分开来是因为存在着文化和民族差异，如果超越了这些差异，我们还剩下什么联系？许多人以某种形式的人文主义寻找新的方向。他们似乎认为，我们身为人类这一简单事实，已经赋予我们一种新形式的全球意义上的休戚与共。不过，我不相信这种共同人性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它太过抽象。

1. 出自《文化研究新方向》多丽丝·巴赫曼-梅迪克所著《文化转向》一文，罗沃尔特出版社，2006年。
2. 克里斯托夫·安特威勒：《人与世界文化》，文稿出版社，2010年。



© Ananya Banerjee - www.ananyabanerjee.net

↑ 印度艺术家阿南亚·巴内基的画。

道的。在黄俊杰教授的书《东亚儒家语境中的人文精神》³中，他精辟地解释说，东亚儒学非常关注人与社会和自然世界——由人和其它部分组成的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由此认为，像这样的一种强烈的“世界和谐”感，能够指导我们渡过因现代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以及社会世界的崩溃，而随之而来的生态和社会灾难。这样的问题需要从跨文化角度讨论。我深信，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提供了极好的空间，来培养这种不同人文主义传统之间的文化间对话。

共享不人道经验

有一种主要由埃里希·弗洛姆⁴提出的理论认为：尽管存在差异，一种共同的人文主义理解是有可能的。人文主义始终是异化经验的结果。这是感觉到有人道尊严的生活条件正在消亡的人们发出的呐喊。在我们这个世界，个人经历可能相差甚远。在我们这个全球性的现代世界中，机会分布不均，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集中不均。

然而，这也是某些异化经验似乎超越了这些差异的一个世

界。我们都遭受着自然环境被破坏的苦难，我们都生活在社会关系不信任感日益强烈的一个社会里。那些较为富裕的人们可能会尝试通过消费弥补缺乏满足感的社会关系，而那些没有这样条件的人们就会感到对消费的一种绝望的向往。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人们受到各种新旧形式的暴力和不公正。政治和经济体制以人们几乎不能认同的方式运作着。

再者，人类在这些不人道条件下的经验，尽管存在相当多的地方和社会差异，在全球范围往往非常相似。这肯定是我们可借鉴的东西，要是我们对全球范围的当代文化加以比较的话。库切⁵笔下的南非与胡宾·冯塞卡⁶笔下的巴西相类；奥克塔维奥·帕斯⁷对现代性的批判可以在西奥多·W·阿多诺⁸的作品中找到。社会和人文科学上的比较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世界各地人们正在遭受的非人待遇的理解。

日常生活中的人文主义

同理，“人文主义转向”不应被视为局限于学术界或知识界独有的努力。前段时间，德国历史学家约尔恩·吕森解释说，人文主义还必须具有“实用”的雄心：“人文主义思想，必须始终处于社会背景下，才能让人信服，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位置”⁹。在我看来，吕森这一表述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只有当人文主义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构成中心影响，我们才能希望开始树立不再是理论和抽象的人文主义文化。我的观点是，这种把人文思想和价值观“翻译”成日常政治、社会和经济行为的工作，首先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任务。但社会和人文科学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至少它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应致力于培育和实施超越象牙塔的人文主义文化。

综上所述，当前逐渐出现在许多学术和非学术舞台的“人文主义转向”，似乎是因超越文化差异，同时又不忽视这些差异而寻找所有人类共性的需要而激发的。它没有从生物本质上寻求普遍性，或者认为需要发明一种普遍适用的人文主义文化，或者把这种文化强加于其它文化，当前的人文主义转向认为普遍性的概念和价值观已经存在于所有文化中。与此同时，新人文主义似乎认识到，全球化的现代性需要所有人类都能同意的规范方向。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这是全球现代性在世界不同地区挑起的共同异化经验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这些思想和价值观转化到日常实践中。■

3. 黄俊杰，《东亚儒家语境中的人文精神》，文稿出版社，2010年。

4.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年），出生于德国，是美国人文主义精神分析学家，和《逃避自由》（1941年）、《爱的艺术》（1956年）及《健全社会》（1955年）的作者。

5.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南非作家，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6. 胡宾·冯塞卡，作家，出生于巴西。

7. 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墨西哥作家和散文家，1990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8. 西奥多·W·阿多诺（1903-1969），社会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学家，出生于德国。

9. 约尔恩·吕森、海纳·拉斯（合编），《跨文化视角下的人文主义：经验和期望》，文稿出版社，2010年。

奥利弗·考兹拉瑞克是墨西哥伊达尔戈州圣尼古拉斯米却肯大学哲学研究所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教授。他是2007年至2009年“全球化时代的人文主义”研究项目成员。自2010年以来，他担任墨西哥“现代性、批判与人文主义”研究项目主任。目前还兼任关于跨文化的人文主义主题的主要系列图书的合作编辑。他的著作包括：《全球化时代的人文主义：挑战与视野》（2009）（与约尔恩·吕森合著），《奥克塔维奥·帕斯：人文主义与批判》（2009年）。



它没有从生物本质上寻求普遍性，或者认为需要发明一种普遍适用的人文主义文化，或者把这种文化强加于其它文化，当前的人文主义转向认为普遍性的概念和价值观已经存在于所有文化中。

© Benjamin Bini - www.benjaminbini.com

← 法国艺术家本杰明·比尼的系列作品《面对灵魂》。这是两个图片的叠加：一个代表人类的脸，另一个面罩代表其想象力。这个系列作品属于当代艺术和原始艺术对话项目。

国际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人文主义——关于文化、人性和价值观的文化间对话”研究项目由德国埃森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由约尔恩·吕森主持。该项目发起了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学者之间的对话，表明不仅在世界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这些人文主义传统可能会成为我们当前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启示。虽然该项目在2009年正式结束，在德国墨卡托基金会慷慨的经济支持下，研究结果仍陆续不断发表。从2009年至今，德国出版商文稿出版社已出版德语和英语系列丛书14卷。而且，该项目的工作通过其它项目仍在继续进行。由奥利弗·考兹拉瑞克主持的，研究资金来自墨西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项目“现代性、批判与人文主义”，即可视作它的一个后续项目。

人文主义的穆斯林阶段

与主流思想相反的是，人文主义是在宗教思想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首先是希腊人，然后是穆斯林，最后是基督徒。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是伊斯兰教的黄金年代，穆尔太齐赖派、法拉斯法先后研究了人文主义理念的局限性，以及在这个由独特的、全能的真主控制的世界中自由意志的概念，预测了十八世纪会有更广泛的途径获取知识。

马哈茂德·侯赛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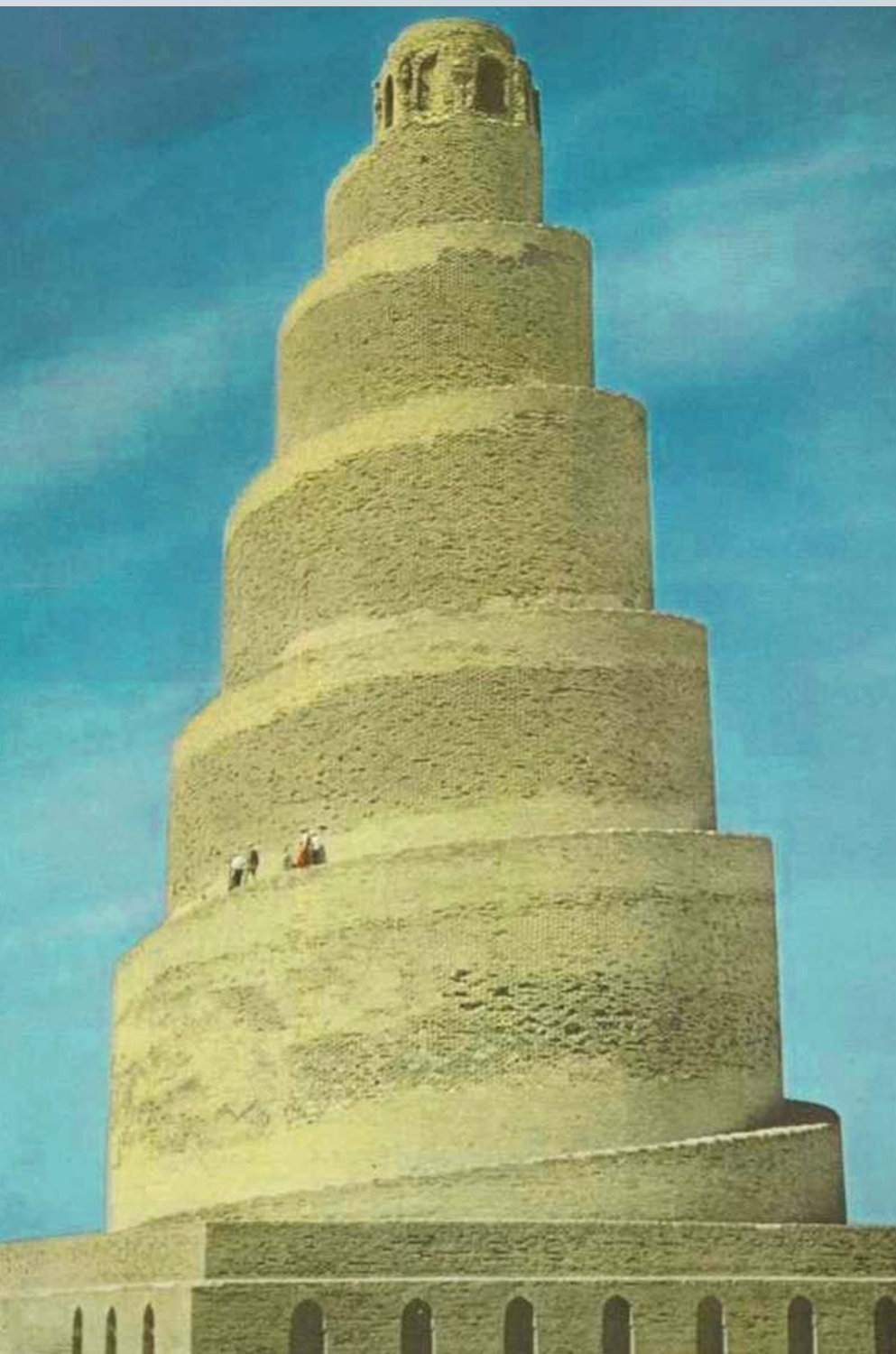
人文主义并没有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兴起，而这一时期众所周知是文艺复兴时期，是人文主义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事实上，人文主义起源于两千年前的雅典，在九世纪至十二世纪的伊斯兰黄金时代继续发扬光大。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特别谈到古希腊的遗产，他们把它作为一个典范，并让它再度盛行。但是，他们想忽略人文主义历史中的穆斯林阶段。

当今，那些持同样观点的人，也在忽略这段时期，因为他们相信人文主义从定义上来说反宗教的。但是从它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来看，人文主义的发展都是在宗教思想的框架内，而不是脱离宗教思想的框架。无论达芬奇¹、米开朗基罗²、莎士比亚³、拉辛⁴、笛卡尔⁵或牛顿⁶都没有质疑过上帝力量。

人文主义反对具有特定形象的上帝：一个无法触及的上帝形象，不考虑人类的痛苦，永远可以决定个人的命运。这是宿命论

← 建于9世纪的伊拉克阿布·杜拉夫·萨马拉清真寺是最重要的伊斯兰建筑之一。萨马拉古城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教义发展出的形象。根据这些教义，人类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自由意志。教义认为，存活在这世上本身并不重要，它只是通往天堂的一条道路而已，而且人类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没有自由意志，换句话说，上帝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人类是绝对无能的。

圣·保罗说：“我们……从出生就已经注定了，在上帝为我们预设的道路上前行。”⁷此后又过了七个世纪，传统主义者和伊斯兰古典神学家坚持这个相同的信念。他们之后七百年，马丁·路德⁸和加尔文⁹也说了同样的话。这与人文主义反对全能上帝的概念是相冲突的。

但是，古希腊如何作为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典范？进行反对宿命论教义的斗争？

心智自由的界限

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单神论的背景下，希腊开始反对宿命论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是个具有特定层次结构的和谐整体。每个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最终是明确的。人类不在宇宙结构的最高层，众神在人类之上。但是，宇宙的法则适用于每个人，对众神和人类是一样的。

因此，这个观点有两点很难被接受：第一，宇宙是抽象的，客观的，不可改变的；第二，众神更加人性化，受到家庭和不确定因素的制约。

人类无力反抗宇宙的秩序，只能尝试走自己的道路。众神虽然有超出常人的能力，但是也有人性的弱点。人类学会了如何谈判和欺骗。最终，人类发现自然根据宇宙的特定法则运作，超越了众神的能力，而人类可以学习并掌握这些法则。

这就是人文主义发展的背景。希腊人创造了一个新的，特别人性化的环境——城邦。在城

邦内，个人不再服从部落和部族的传统权力。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美德可以胜过出生的特权。

在民主的城市，辩论是广泛的，言论决定最高权利。为了说服他人，必须论证。抽象逻辑的原则无论如何都是行之有效的，这促进了哲学和数学的研究。因此，人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展出强大的影响力。

因此，在古希腊时期，人文主义者设立了心智的自由和心智能力的界限，并没有质疑世界范围内的整体秩序和众神的力量。正因为这一点，人类生活的本身变得有价值。

有效的力量或人的力量

单神教的上帝改变了这种情况。它不但获得了由希腊众神行使的部分权力，而且获得了众神和人类的宇宙力量。上帝拥有全能的、主观的、有创造力的、积极的力量，取代了宇宙抽象的、客观的力量。上帝成为唯一全能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信徒必须在这个全能的范围内探索自己的自由。毫无疑问，这是用人类少得可怜的力量与上帝无限的力量进行较量。谦卑地说，这促进了心智、道德和美学的发展，个人可以在这些领域展现创造力。虽然这与上帝的旨意不同，但是并没有质疑它的至高权威。

这一概念最开始是在九世纪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巴格达形成的。

那时，庞大的伊斯兰帝国繁荣富强，容纳了多种宗教和文化，其首都是在巴格达，有一百

1. 达芬奇 (1452-1519)，意大利画家、博学者和人道主义哲学家。
2. 米开朗基罗 (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
3. 威廉·莎士比亚 (1564-1616)，英国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
4. 拉辛 (1564-1616)，法国古典剧作家。
5. 笛卡尔 (1596-1650)，法国数学家和理性主义哲学家。
6. 牛顿 (1643-1727)，英国物理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
7. 以弗所书
8. 马丁·路德 (1483-1546)，德国神父和新教创始人。
9. 加尔文 (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学者，新教改革的主要架构者。

↓13世纪初期叙利亚阿尔·木巴斯斯尔的精緻艺术品：苏格拉底（左）和他的两个学生。



万人口，而罗马当时有三万人口，卢泰西亚只有一万人口。在贸易方面，信任就是通用原则。因此在印度签署的交易账单，与在遥远的摩洛哥一样，都会得到承认。

伟大的哈里发们决定接受这项权力和多样性，同时鼓励智性思考。他们支持古老知识的复兴，包括希腊科学和哲学遗产，这些知识很快被译成阿拉伯文。

这个时代的宗教学者们的神学运动，在这个环境下蓬勃发展起来。例如，穆尔太齐赖派从理性思考和探究的角度，解释古兰经。

根据这一解释，人类是与其它生物不同的。因为真主赐予人类有效的、永恒的力量。凭借这个力量，人类的行动是自由的。

这种自由让人类扮演“真主在这个世界的助手”这一角色。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应该是卑微的，恰恰相反，应该是自信的，展现出他们的自主意识，发展他们的才智，目的是构建一个平等团结的穆斯林团体。

对于这个团体，生在尘世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如果可能的话，提倡帮助他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在适当的范围内，赞赏美，珍惜身体，激发快乐。

“真主为你们以地面为居处，以天空为房屋，他以形象赋予你们，而使你们的形象优美，他供给你们佳美的食品……”（古兰经，40章，64节）

在审判日，每个人都要亲自回答他们一生中做过的好事和坏事。因为真主对他们的行为了如指掌，它将根据理性的道德判断，奖励或惩罚。

一些最伟大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支持穆尔太齐赖派的理念，甚至将该理念强加给了宗教精英们。这个行为如此大胆，另人不安，以至于最后大部分传

统主义者、法学家和神学家团结在一起反对这个理念。

他们拒绝用理性解释真主的行为这一理念，因为在这个范围内限制了它的全能。真主的意志是一个谜，它不受到任何限制。因此，根据真主深不可测的意志，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真主具有奖励和惩罚的特权。

这个理念充分表达了宿命论的信条，似乎是不公正、不道德的。这要求信徒无条件地接受全部信条，服从真主的意愿，而不是理解它。这样，个人才能把希望寄托在真主的怜悯和同情之中。

多角度理念的引领者

到九世纪后期，穆尔太齐赖派与传统主义者之间发生冲突，这是一场有利于后者的冲突。他们不仅摧毁了自由意志的概念，而且驱逐和压制了所有出现在穆斯林思想中的理性主义运动。

他们反对法拉斯法（哲学家），法拉斯法追求一种全面的、可以包容所有领域知识的方法。他们补充了希腊人发展出的学科——医学，数学，天文学和药理学，而且是真正研究这些学科本身，并不是万能的神的描述。

阿尔·肯迪¹⁰，阿尔·法拉比¹¹，伊本·西纳¹²和伊本·路世德¹³发展出一个新的哲学。该哲学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与单神论是一致的，这启发了迈蒙尼

德¹⁴和之后的托马斯·阿奎那¹⁵。哲学家发现的真理与上帝向先知揭示的真理，在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先知们的认识是通过瞬间的启示，而哲学家是通过理性思考，一步步发现的。

法拉斯法因此在单神论的框架内探讨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对于权威思想，甚至是基于神的启示，都会采用理性辩论的方式，这预示着十八世纪多角度理念的来临。

法拉斯法派的影响比穆尔太齐赖派更长，但是具体的影响不如穆尔太齐赖派。一段时期，法拉斯法派在巴格达、科尔多瓦和开罗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但也消沉了很长时间。在十二世纪后期，伊本·路世德去世，他们的理论的权威性也随之结束了。

与此同时，伊斯兰帝国分裂成两个帝国，随后又分裂成三个敌对的帝国。在对抗耶路撒冷周围的十字军和安达卢斯的天主教国王们中，伊斯兰教国家遭受到主要的军事挫败。不久之后，蒙古人入侵，摧毁了伊斯兰教国家。

伊斯兰国家彼此间的猜忌导致了他们的逐渐衰落。权力从有教养的王子们手中转移到军事首领那里。此时，对已确立的信念的谨慎保护，取代了自信的知识探求。在伊斯兰世界，失去了自由意志的观念和人文主义方式的重要性。

每一所欧洲的大学都会教授穆斯林法拉斯法的作品，这些作品已经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经过数世纪，这些作品带来的巨大影响，引发了文艺复兴的思潮。■

马哈茂德·侯赛因，埃及政治学家和伊斯兰教学者。最新著作《古兰经的思考》，伽利玛出版社，巴黎，2011年。

10. 阿尔·肯迪 (801-873)，阿拉伯著名的哲学家，希腊手稿的译者。

11. 阿尔·法拉比 (872-873)，阿拉伯的哲学家，柏拉图作品的评论家。

12. 伊本·西纳 (980-1037)，波斯哲学家、作家、医生、天文学家和炼金师。

13. 伊本·路世德 (1126-1198)，安达卢西亚的哲学家、律师、数学家、医生和伊斯兰神学家。

14. 摩西·迈蒙尼德 (1138-1204)，医生、哲学家和安达卢西亚的拉比。

15. 托马斯·阿奎那 (1224-1274)，经院哲学和天主教神学的主流大师之一。

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道家讲大爱，释家讲慈爱。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可以被视为普遍和谐的发展模式，即新人文主义发展模式。

刘吉

© 邱正平/教科文组织



↑ 缎纹宣纸中国书法《爱》。画家邱正平于2006年教科文组织成立六十周年之际赠送给本组织。转载得到作者友情授权。

为了和谐 社会

新人文主义并不是那么新。这是一个人类制造的进化产物。我们可以将它的出现与出生于比利时的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乔治·萨顿（1884年至1956年）联系起来。乔治·萨顿从科学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人文科学。他研究科学

的起源，以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他捍卫了综合的科学哲学，以弥合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即“新人文主义”。

但是，通常，美国文学评论家欧文·白璧德（1865年至1933

年）被认为是新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白璧德被当时美国逐渐出

改编自刘吉于6月27日、28日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第九届中欧论坛上发表的演讲稿《迎接新人文主义时代》。

现的物欲横流的社会现象所震惊，认为西方已成为本能情感和个人主义的受害者，呼吁节制放纵行为。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者，他的主要观点与当时的学术潮流相冲突，引起争议，但这些观点仍然提供了广泛的哲学辩论，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思想保守的知识分子。

白璧德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把他的人文理念引入了中国政治领域和文学领域。由于其思想受到佛教和儒家价值观的启发，因此从文化上吸引了他的中国学生。他们结合中国，改编成新的人文主义，反对“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号召人们抛弃中国传统价值观，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新思想。

中华文明的许多内容都可以为新人文主义作出贡献。伏羲帝（公元前2953年至2838年）撰写了中国最早的学术著作之一《易经》，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应该学习如何改进和尊重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德、情、和、爱。

德、情、和

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崇尚“德”，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指导着中国人的言行，使中国人通过自己内在修炼以自觉规范合理的社会行为。西方文明则通过科学理性和法治等外部力量来规范社会行为。

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大脑的两半球非常相似：左脑掌管理性，右脑掌管感情。只有当左脑与右脑联合运用，才能充分发挥人脑的潜力！因此，理与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人文表现，应成为新人文主义的重要内涵。

中国人非常重视“情”。砸锅卖铁也得还人情。中国人认为，家庭亲情是神圣的，尽量避免公开冲突。但中国人也承认“忠孝难两全”。“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文理念。个人形象要“和气待人”，家庭团结“家和万事兴”，商务活动“和气生财”，治国理念“和为贵”。这些与西方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完全不同的。

“和”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自古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

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大脑的两半球非常相似：左脑掌管理性，右脑掌管感情。只有当左脑与右脑联合运用，才能充分发挥人脑的潜力！因此，理与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人文表现，应成为新人文主义的重要内涵。

我们应该学习如何改进和尊重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德、情、和、爱。

天人合一。

人文主义的儒家根源

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道家讲大爱，释家讲慈爱…在中国不论哪家学说都十分重视爱这一主题。

中国大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年 - 479年）的学生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另一个学生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从仁爱出发，儒家最后的理想社会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大家共享社会财富。

孟子（公元前372年至289年）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还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此‘四端’。”

孔孟之道成为此后三千年引领中国社会的主流人文理念，直至今今天仍有着无法忽视的社会影响。有些思想家认为，18世纪欧洲启蒙学家们正是受到儒家理念的影响，才写出了伟大的《1789年人权宣言》。

添加这些中国文明元素，必将大大丰富新人文主义内容。历史在飞速前进，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大同世界这一全人类共同理想，呼唤着新人文主义。■

刘吉是中欧国际商学院的名誉院长和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1951年的教科文组织， 迈向新人文主义

© Laurent Goldstein/La Collection

←法国摄影师洛朗·戈尔茨坦的系列作品《金色眼睛之映像》。转载得到作者友情授权。

幸。一种关于人类真相和能量的全面意识将会替代目前人类过度的、过时的自负。

四百年以来，人类极力通过分析将一切——包括人类自身——分离开来，现在又回到综合方式，使人的灵魂复苏。由此，世界上所有时期、所有地方的价值观，又都找到了它们的用途、顺序和层次。不管是起源于东方，还是西方，它们不再是对手，而是融合在一起，迈向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出于真实的内在需要（不是一些值得质疑的愿望）而倾向于普遍性。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解放长期以来被西方思想家禁锢在框框内的思想。新人文主义应该能将西方知识分子获得的指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应运到早已被遗弃的精神领域的重新发现上来。知识不应该让人类冒滥用猜测和窃取之风险，知识不再会有无限力量使人成为全能的人——我们不需要主要由大脑控制的物质的人，而是要灵和肉结合的人，用他的意识去迎接神秘。

我们相信，如果能建立起这样的新人文主义，东西方将看到很多将它们分开的东西会消失，而出现将他们和所有人凝聚起来的东西。■

四百年以来，人类极力通过分析将一切——包括人类自身——分离开来，现在又回到综合方式，使人的灵魂复苏。

六十年前，教科文组织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了“东西方文化和哲学关系研讨会”，确认了新的全体论人文主义思想。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发表一些参会者的演讲稿摘录，将其命名为“迈向新人文主义”。当时，亚洲国家纷纷独立，但世界还沉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中。那次研讨会的首要目标是将东西方文化结合起来。

(…)四个世纪以来，西方人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单靠人的智力，不管其他，使人成为他自己和宇宙的主人(…)。所谓全能的人，就是将整个世界缩小为人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想修正人文主义并使其发扬光大，就应该放弃这种错误思想。

当然也不是摧毁它，这一点我们已经说了，我们不否认由同样的科学精神带来的积极成果。在一定时期和某些地方，西方人文主义代表了人类取得的具有卓越价值的成就。我们不能再允许的是它的排他性。(…)追溯人文主义这个词的来源，我们知道：它并非起源于十六世纪；欧洲地中海地区并非是其永久而唯一的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某些思想也并非是其的唯一源泉。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放回必要的界限内，就知道它现在面临的危机并不令人吃惊，也不是万劫不复的灾难。但如果我们固执地坚持人类理性独尊，那将是绝对的不

全文（仅有法语版）由法国作家安德烈·鲁索编辑：
www.unesco.org/new/unesco/resources/publications/unescodoc-database/

全球化 应以人为本

法国法学家米莱尔·德尔马斯·马蒂的信条是：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利用法律的“预想效力”¹，建立一种法律的、多元的、开方的人文主义，将其运用在各种方面，如持久和平、全球气候变暖、或新的数字技术和生物医学技术的管理。

米莱尔·德尔马斯·马蒂
回答雅斯米娜·萨波瓦的提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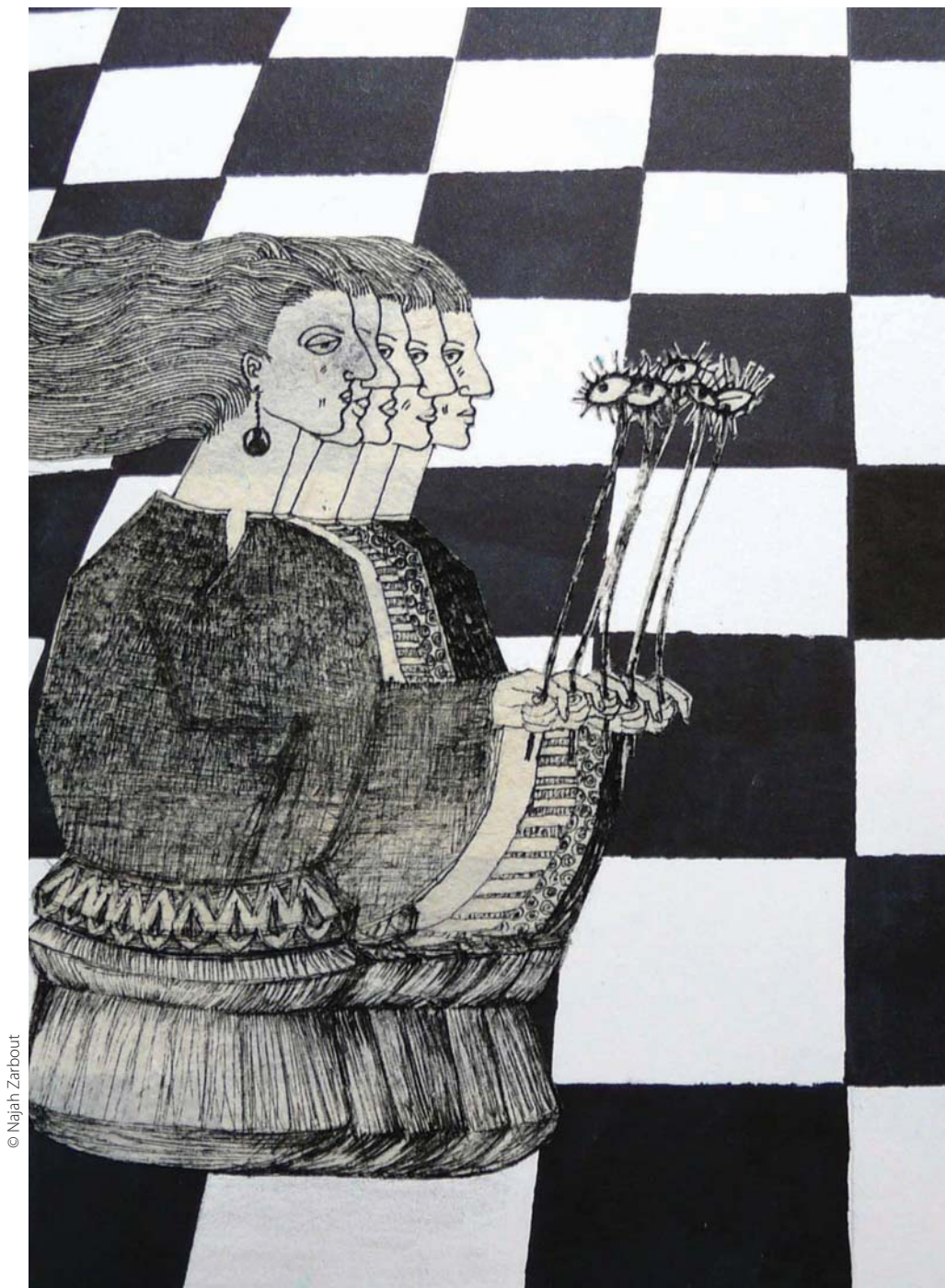
在全球化进程中，法律制度是否比以前更加人性化，还是大致一样？

乍一看，随着法律文书的增加、国际机构对人权的整体监控、人文主义法律和普遍适用的刑事司法的出现，法律人文主义似乎得到了加强。在经济方面，全球市场旨在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繁荣。

所以，一切似乎都是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全球化就像一个放大镜，暴露出一系列的矛盾，引发了大量的问题。例如，我们该如何调和与安全概念与自由原则的矛盾？经济权利与环境保护？等等。全球化甚至可以让形势恶化，例如，它把社会权利——金融市场的限制削弱了某些国家的力量，而社会权利旨在重振这些国家——和已经全球化的经济权利分开。我们甚至不知道1948年《人权宣言》规定的普

→突尼斯造型艺术家娜迦·扎尔布的作品。

<http://najahzarbout.blogspot.com>



© Najah Zarbout

遍主义，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之间是否有矛盾，后者认定文化表现形式为人类共同遗产。

这些矛盾如何体现在现实生活中？

最显著的矛盾与移民有关。国家的边境对贸易和资本是开放的，但对人是封闭的。甚至，很多国家有加大控制和压制移民的趋势，以至于把移民与犯罪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这些国家，他们迫使全球市场开放，

造成当地市场动荡，促使人们背井离乡。总而言之，是同样的人在一边制造移民，一边压制移民。

同时，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分离使增长仅仅限于经济和金融利润，但没有抑制住不稳定性和社会排外问题的加剧，无论是在失业还是贫困方面。经济繁荣的同时，加大了收入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的差距。

最终，自然资源的开采——跨国公司在该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使得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冲突，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这就是尽管已经建立了国际刑事法院，战争、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和侵略还是不断爆发的原因。国际刑事法院只是在近年（2002年）才生效，仍然有一些结构上的争论。国际刑事法院的法规不涉及法人的责任²，因此当企业犯罪后，无需受到惩罚。这毁坏了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劝诫者的角色。和审判罪行的特设法庭³不同，国际刑事法院永久性地工作。

经济权利与环境权利之间的矛盾是什么？

发展和竞争的必备要求是，阻止国家采取行动保护环境。那么，该如何保护地球，使其不受气候变化、生物种类的减少或水污染的负面影响呢？（请看第34-35页）。当工业化国家的承诺调整到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一致时，后者提出了历史权益的概念。也就是说，因为工业化国家最初对地球的污染负有责任，他们现在应该共同努力，保护环境，并允许其他国家也发展起来。“可持续发展”应该促进经济权利和环境权利的协调，但是只要没有融入公平发展的概念，这仍然是一个幻想。

新技术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这是不是陷入了悖论？

技术一直是“新的”，改变的是创新的速度。在数字技术领域，法国法律无法与技术保持同步。宪法委员会刚刚在法律中加了一条新条文，技术已经转变，避开了法规。

信息技术可以帮助加强民主，正如我们最近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所看到的。但是，它也能促使“监视性社会”的形成。

在生物技术领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通过人工生育，可以对抗不育。采用植入前遗传学诊断选择胚胎，推进了优生学，但这种行为也被认为是种犯罪。因为广泛使用这种方法将减少遗传选择的偶然性，从而减少人类的生物多样性。这就是出现的悖论——在个人自由的名义下（控制人的身体和繁衍），我们的社会面临人工塑造人类的风险。（请看第39-40页）。

另一矛盾之处是，我们越依赖数字技术，就越会失去更多的自主性，但同时我们制造出更多有自主性的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帮助老人和病人，让生活更美好。但在美国和法国，已经推出开发机器人的项目，以取代有血肉之躯的士兵，在达到军事目标的同时，无需有民众的损伤。这就要在机器人的程序中植入道德规则，但程序完全有可能出错。况且，最重要的道德规则通常极其微妙，即使有精确的数学，也很难作出预先的判断。

这些例子都表明了一个非人性化的进程。对此，法律能做什么？

在这加速变化的世界，法律的角色也面临很大困难。我们需



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法律人文主义”的概念，而是需要建立更加动态的人文主义。我们需要扭转现实中非人性化的发展方向，而不是一再重申原则。只有通过有效地维护人权，才能避免一些脱离常规的极权政治行为，如市场极权主义，尤其是在金融市场。

法律有什么办法？

法律无法给我刚才提到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是，现在有一些法律流程已经开始应对这些问题，以使全球化以人为本。

例如，创建一个多层次的公民体系。这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但是能改善一些移民问题和环境问题。

“世界公民”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梦想。就离我们比较近的时期来说，在18世纪后期的德国，康德梦想国家间能永远和平⁴，正如在19世纪末的中国，康有为⁵梦想大同世界。

康德和康有为的梦想可以逐渐变为现实。我们已经看到，设立欧洲公民身份可以对国家公民身份起到补充作用，而并没有损害国家公民身份。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⁶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带来了一种全面的方式，将人文理念注入经济领域。我们在等待移民国家批准联合国关于《保护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权利国际公约》（签署于1990年！），这标志着某些权利开始得到认可，预示着世界公民的到来。

通过展望未来、面对全球风险，我们开始把人类看作一个有共同命运的团体。但只有参考人类历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帮助建立、传播——才能构造文化融合的公民体系。这是融合的

文化，而不是多种文化的孤立。因为我们的远大目标是建立互惠的人文主义。（请看第14-16页）。

用人文主义来管理全球，是否是乌托邦？

目前它仍然是乌托邦。权力——由几个国家和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分享——分配不均，使得管理全球的组织面临极大的困难。我们应该做到，在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况下，要权力拥有者承担责任。在国家层面，这种过程开始在欧洲理事会内部（凭借《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和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拉丁美洲（虽然加拿大和美国没有批准《美洲人权公约》）、最近在非洲（凭借《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运作。在世界人权法院还没出现时，建立了这些小规模的约束机制，但是不够充分，而且分散。

还有跨国公司呢？

所谓的社会责任是“软性法规”（指导原则、行为准则等）海洋中的一些“硬性法规”⁷小岛屿。在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

下，跨国公司所在的东道国既没有方法、也没有意愿去追究，因为害怕失去他们提供的就业机会。母公司所在的国家很少有决定权（也不想有）追究在境外对外国受害者所犯的罪行。

但是，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法案（《外国人侵权索赔法》，1789年）赋予美国联邦司法机构权力，起诉任何违反人权的人，甚至在国外针对外国受害者也通行。这项法案最近已经采用，用于防范跨国企业犯罪。但是判刑是罕见的。

然而，我并不赞成这种“全球管辖权”的原则，因为这等于让超级大国担任全世界的法官。在没有世界法院的情况下，我们将需要一项国际公约。当跨国公司侵犯人权时，该公约能够赋予其原籍国相应的权限。如果原籍国不起诉违法者，该公约将会给东道国提供相应的资源（人员和后勤）来起诉。

能不能提交到国际刑事法院？

即使我们把国际刑事法院的权限扩展到法人，也只能审判跨



国公司的一些最严重的罪行，例如种族灭绝、反人类罪、战争罪等。但是，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起诉现任的国家元首，这不仅是政治革命，也是法律革命。不幸的是，如果它没有一支警察部队的话，是无法实施逮捕的。目前它呼吁各国合作，或寻求联合国和北约军队的帮助，但是结果很不令人满意。法律与军队的联系，需要全球视角。

法律与和平之间的联系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如果不伸张正义，持久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是，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表明，不把所有罪犯绳之以法，而只把那些不承认罪行的人缉拿归案，照样可以建设和平。在这一点上，如果为了避免出现我认为是“法律原教旨主义”，西方国家有很多都应向非洲学习。这里提到的“法律原教旨主义”，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一样，会限制和拒绝新思维。法律的要求和和平的需求之间必须相互协调。在拒绝让犯罪不受惩罚这一点上，不要太过死板。

您怎么看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这一点已经写入《法国环境宪章》。

涉及子孙后代的事确实开始出现在法律文本中，特别是这个宪章具有宪法效力。但是在实践中，需要一定的想象力才能把子孙后代纳入法律。谁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责任的承担期有多久？如何补偿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等等。

我个人不愿意谈论子孙后代的“权利”，以及自然或动物的“权利”，因为不可能有互惠。但是因为具有责任心，人类仍然需要对他们的子孙负责，同时也要对人类以外的生物负责。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小心，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人类义务”的概念是争论的话题，曾经把国家暴政合法化。当“人权”的表达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要能够制衡权力的滥用，限制有可能将国家的理由（或缺乏道理）

↓米莱尔·德尔马斯·玛蒂说：“国家的边境对贸易和资本是开放的，但对人是封闭的。”喀麦隆艺术家的作品《新世界高潮》体现了这一思想。

“合理化”。另一方面，即使关系不是互惠的，仍然需要确认相应责任。同时，也需要找到适当的平衡，因为我们对后代负有责任的同时，也不能破坏当代人的权利。

所有人都在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危险，您曾经说这是现代人文主义面临的挑战之一。

我们不能禁止所有的技术创新。禁止革新将会是荒谬的。纵观历史，通过发展技术并使其全球化，会使人类变得更加人性化。（请看第32-33页）。我们将车轮、轮式手推车、指南针等都推广到了全球。但是，我们不能认为所有能够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创新本身不可避免，抵抗创新毫无意义，重要的是让法律对策能够适应技术创新的发展。

科学家和政治家之间——即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一些改进，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两者间会有差距。国家捍卫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除了一些行动力很弱的国际组织，没有人捍卫全球利益。专家们填补了这个空白。原则上，他们没有决定权，但是在实践中，他们在科学创新和相关应用方面发挥



© Laurent Goldstein/La Collection

- 1.《预想效力》是米莱尔·德尔马斯·玛蒂一本书的书名。
- 2.法人是一个实体。与自然人的不同是，法人是一种法律存在，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 3.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成立于1993年，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成立于1994年。
- 4.康德在1775年写成的《永久和平论》中总结了“和平”和“自由国家联盟”观点的启蒙思想运动。
- 5.康有为《大同书》（繁体），L.G. 汤普森《康有为一个世界哲学》，伦敦，1958年。
- 6.首届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于2007年在布鲁塞尔举办，是交流实践经验的平台，力求定义国际移民的最佳方法，从而促进发展并减少负面影响。
- 7.“硬性法规”是指传统的法律形式，而“软性法规”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



↑米莱尔·德尔马斯·玛蒂。由艾玛纽尔·马查度尔拍摄。

起着关键作用。专家们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地位，但是各地的机构开始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并避免利益冲突。

但是用法律来适应由新技术带来的变化，或试图预见未来的风险，是远远不够的……。

确实是这样。还必须考虑双重性。技术造成非人性化，比如“监视性社会”的形成或物种的塑造。如果我们不想失去我们已获得的人文主义成果，就要抵制这些问题。因为全球化会抹去每个民族的历史。

有道德标准的人性化社会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这很难预测。这样的社会将随着不同人文理念的接触、不同文化的交融而逐渐出现。甚至“人类尊严”这个概念，也不是板上钉钉，仍然需要巩固，特别是关于妇女地位的表述。

然而，包括反人类罪，禁止酷刑、不人道、或侮辱对待的这份清单的存在不明言地表明了人性的共同点。每个人都是独特

的，在社会中是平等的。同时，新技术带来的风险表明，需要加入第三点——非决定论。人类不是事先就已确定。这是自由和责任的基础。

基于以上三点，法律也可以发挥三方面的作用：抵制、控制和参与。抵制非人道主义；控制全球力量，使其承担责任；参与未来的风险。这可能成为新人文主义形式。它不是固定的教条，而是可以看作人文主义实践的动态过程。■

米莱尔·德尔马斯·玛蒂（法国），2007年当选道德和政治科学院院士，从2002年开始担任法兰西学院“比较法学和法律国际化研究”教授。她教授的课程质疑法律体系中的人文主义——而这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

她的主要作品包括《面对真实的习惯法》（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多元化秩序》（哈特出版社，2009年）。值得一提的是，《预想效力》这部巨作包含几册，最后一册将于2012年出版。

随着科学的进步，政治的发展，人文主义的概念也在不断演变。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技术使各类文化更易融合，同时也促进了民主，让人文主义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形式。

米拉德·多维希

现今社会沟通日趋全球化，我们称其为“信息社会”。这使一些人类学家反思他们这一领域的基本问题和类别，也就是交流的形式以及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方式。

对于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1908年—2009年）来说，人类学不仅是人文学科，也是各种形式的人文主义的产物，是历史和西方社会发展的标志。列维·施特劳斯在1956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¹写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在结论中指出了人文主义的三种形式：复兴人文主义——以重新发现经典的古代文献为基础；东方人文主义——与东方和远东文化知识相关；民主人文主义——与人类学相关，接纳一切人类社会的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种形式的人文主义与文献的发现、口头传统或者其它文化的表现形式密切相关，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促进了新的批判性方法和新知识的发展。对于复兴人文主义而言，希腊文和拉丁文知识、历史认知和内部批判摧毁了



◀比利时艺术家托马斯·以色列的互动录像装置《流》。比利时列日知识城，2010年。

数字 人文主义

© Thomas Israël

随着数字技术的诞生，读、写、交流等文化实践也不断受其影响。正如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1872年—1950年）指出，通过技术设备，不仅可以改变个体行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周边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技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时间、空间的类别，这也加强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汇和融合，消除了界限和地理距离，加速了沟通，从而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数字技术主要建立在西方社会文化模式的基础上，有其局限性。数字技术不能克服语言障碍，不能避免被人滥用，而且在全球的发展也不均衡。这一点加大了贫富间的不平等。

尽管如此，数字技术已经变得全球化，是一种通用的沟通工具，甚至是民主化的推动工具，正如我们在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所见到的。

在数字化文化呈现出的神话、发现以及理想国中，其融合的空间成为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让地球村变为现实。数字化人文主义是思考这种新现象的一种方式。■

那些像教会一般强大的权威机构。对于东方人文主义而说，由于东西方的交汇，促进了比较主义的发展，新科学和学科也相继发展起来，例如语言学。此外，民主人文主义促使了结构化方法的诞生。这三种形式的人文主义让列维·施特劳斯以独特、全面的眼光观察世界，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表现形式下，发现潜在的秩序。对于结构主义之父来说，这种秩序是人类思想的标志。

值得记住的是，这三种形式的人文主义与政治的发展是一致的。第一种针对的是贵族阶层，仅限于少数享有特权的阶层；第二种针对的是资产阶级，其伴随西方工业化发展；第三种针对的是广泛的民主，不排斥任何人。

基于全面的考量，我想非常谦虚地说，我们要提出第四

种人文主义形式——数字化人文主义。

第四种人文主义

数字化人文主义是我们复杂的文化遗产与技术交汇的结果，这项技术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交空间。这是新的交汇，在虚拟的环境中，概念、目标以及相关的实践都需要重新定义。

与列维·施特劳斯定义的三种形式的人文主义一样，数字化人文主义与新技术密切相关。这些技术上的发现，开启了多项领域的研究，颠覆了现有的社会文化分类。

在技术和经济方面，数字技术需要不断地经受推敲和质疑。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在改变我们对目标、关系和价值的认知观念，为人类活动领域带来新的视角。

米拉德·多维希，美国宗教历史学家，魁北克克拉瓦尔大学数字化文化研究主席，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数字文化》、《人心的退步史》等。

- 1.《社会科学如何让技术文明更加人性化》，1956年8月8日收录的文档，2008年5月首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的专刊《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遥远的目光》上发表。全文请查阅《信使》电子文档：<http://www.unesco.org/new/zh/unesco-courier>

欢迎来到人类世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创新使人类摆脱了与自然联系在一起束缚。这本该算是进步，却可能会导致一个悲惨的结局。气候变化向我们表明，现在是我们该停止在自己的生态位上陌生人一样的行为的时候了。

露丝·欧文

我们的现代文明中经常突然出现启示的场景。我们已经见识过经济管理不佳导致的饥荒和争夺黄金、石油和钻石的战争。生态灾难和全球核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文明曾在过去消失过，而我们的文明也可能走到了尽头。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潜在灾害名单在不断增长，现在，气候变化如核冬天，也被添加到了名单里。

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不像核战争那么清晰易辨。科学界“非常有信心”地认为，大气中发生的变化是人类工业活动的结果，是由过去150年中排放到低层大气中的数十亿吨温室气体造成的¹。

气候变化不是由任何个人引发的，因而任何个人——甚至即使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制止现代工业技术。诚然，消费者大众规模的决定可能会改变企业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方式，这反过来可能会影响气候变化。但是，要从根本上充分应对气候变化，正是“消费者”的作用需要有所改变。

个人可以并且确实有人以非常生态友好的方式生活着。但这些人很快意识到，当整个社会不是为了在生态留下“轻微足迹”²而设计时，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困难。欧洲和中东地区的古代城

市，要比人口稠密、到处是水泥丛林的新世界更容易徒步行走。在新世界，公共交通是更有效的旅行方法。但在城市扩张衍生出的郊区人口密度低，如果没有妥善安排的公共交通，汽车依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那么，最终要靠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作出正确的决策。然而，在国际范围内——这正是我们的未来上演的范围——明显缺乏领导力。自1995年以来，在每年举行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上，我们的政治领导人都未能对现代社会流行的科技规范提出挑战。

我认为，那些领导人觉得难以挑战现状的原因在于，现代科技和全球经济这两个工具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我们都因此而内心挣扎。改造这两者似乎是不可能的，那无异于文明的转变，和从一个生态时代转变到另一个生态时代。不过，根据英国皇家学会的说法，这恰是我们已做到的事。

在2010年，这个令人尊敬的机构正式宣布，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地球已经从温和平静的全新世时代——这个时代持续了一万多年，见证了农业和城市文明的发展——进入了动荡和可能是灾难性的人类世时代。

这种转变无疑早就开始了，至少从1945年（我们进入核时代的那一年），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从大约18世纪末，工业革命



↑莫桑比克马普托一景。

明显改变了人们与当地生态系统的关系之时就开始了。

人与自然之间被破坏的联系

后工业时代的技术给现代人一种感觉，即虽然人类与自然其它组成部分是联系在一起的，可

1. 《气候变化2007：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
2. “生态足迹”根据人的生活方式（相对于再生的消费）测量所需土地面积。
3. 19世纪初的“工人运动”由卢德领导，在英国发起，捣毁被认为是失业的罪魁祸首的机器。



全球化——是新生态吗？

虽然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具有生态意识的人们存在，他们对现代生活规范的影响是有限的。个人的道德意识对势不可挡的现代进步而言几乎没有意义。但是，气候变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全球意识到了现代工业技术的规模及其副产品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

人类世时代可能成为地球上主要的灭绝时期，就像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灭绝之时。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清楚地明白现代技术进步在全球和行星范围对生态造成的影响——除非发生剧烈的变化改变这一影响。

但是，这种变化来得缓慢。比如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贸易制度，说明真正被考虑到的生态现实的规模是多么的小。

这不是一种像卢德分子³那样反对技术进步的立场。但是，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的生态位中再保持陌生人的姿态了。现代性的范围是全球性的，我们的生态位也已经变成全球性。气候变化清楚地告诉我们，生态边界的条件需要认真对待。人类可以用想象力自由构建理想现实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人类活动、技术和经济活动需要与严酷的生态现实条件相符。

气候变化在我们心中唤醒的行星生态意识，应能迫使我们换掉现在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规范镜头”。没有在国际范围内强有力的政治决定，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全球化也可被看作是“新绿”化。■

露丝·欧文是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商业道德高级讲师。她是《海德格尔，政治与气候变化》（2008年）一书的作者，和《气候变化与哲学：变革的可能性》（2010年）的编辑，两书均由伦敦连续介质出版社出版。

他们却不受这些联系的束缚。在城市，我们不再依赖于当地的时令产品。与18世纪的人们10公里左右的步行距离相比，冷藏运输和储存技术使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们可以从遥远的地方进口食物和其他商品。如果作物欠收，我们不会像过去一样被饿死——而这改变了城市居民与当地生态环境的关系。我们可能甚至不知道周边农村地区发生了洪水或干旱，或者我们的饮用水从何而来，或者我们的森林有多健康。而且，随着全球城市地区人口比例的增长，城市不断因众多技术和经济需求，而不是公众需求，

而蔓延到周围的乡村地区，这决定了城市的建设方式。

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居住城市的实物形态以及我们农业、矿业、能源生产、林业、渔业和商业的模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使世界大部分地区变成了现在看起来的模样。

我们的社会已经被深深地植入了现代技术创新发展的节奏和期望，以至于它们缩小了地球在我们眼中看到的范围，使之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甚至影响到了我们对自己作为人类“个体”的理解。

科学梦

科学因其赋予使用者和应用者的力量，使我们提高了对通过计划和组织，推动人类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期待。然而这常常被证实是一种危险的求索……。

米哈尔·迈耶

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怪物从实验室逃出后，狂乱地制造了一系列的杀戮和破坏。然而，这个怪物在心底依然保留着一点良知：他渴望友谊和爱情，他还帮助了一个饥饿的家庭。

玛丽·雪莱的这个著名的故事至少有一部分是在讲述被遗弃的责任。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希望“将耀眼的光明投向那黑暗的世界”，最终却放弃了对其创造出的生命应负有的所有道义责任。从这一主题产生了好莱坞电影中一大帮追求权力、不顾责任的疯狂科学家。

科学（和技术）是征服世界的力量，而且这力量正日益征服人类的生物自我。科学和人文主义的组合，旨在用科学造福人类。然而，我们往往忘记，用科学造福世界，是与科学本身一样古老的项目。在当今现实世界中，我们如何使用科学是有关意义、价值观和责任的问题。

科学与人类定义

举超人文主义为例，它侧重于对个人而非社会的改善。超人文主义以未来为导向，依赖新技术和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才能找到的技术。其最终目标是超越人类的生物限制，创造出一种基于技术的不朽。虽然超人文主义的技术起源是二战后出现的控制论、纳米技术和基因工程，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源于古代炼金术士对炼出魔法石的追求。据称，那些足够聪明炼出它们的炼金术士，几乎因此而获得了永生。

超人文主义的范围广泛，其范畴从当前的现实到未来主义的

超现实，从干细胞疗法，到把人的意识上传给机器——在这一点上，超人文主义变形成为了一种奇怪的宗教性合成物。超人文主义者英国思想家马克斯·莫尔写道，超人文主义是“那些有关拒绝接受传统人体的限制，如死



← 达尼卡·比杰拉克摄影作品
《闪光之人》

因大量的移民潮，城市成为堕落和退化的温床，一种文化上的强烈恐惧酝酿产生，与优生学时代的科学知识交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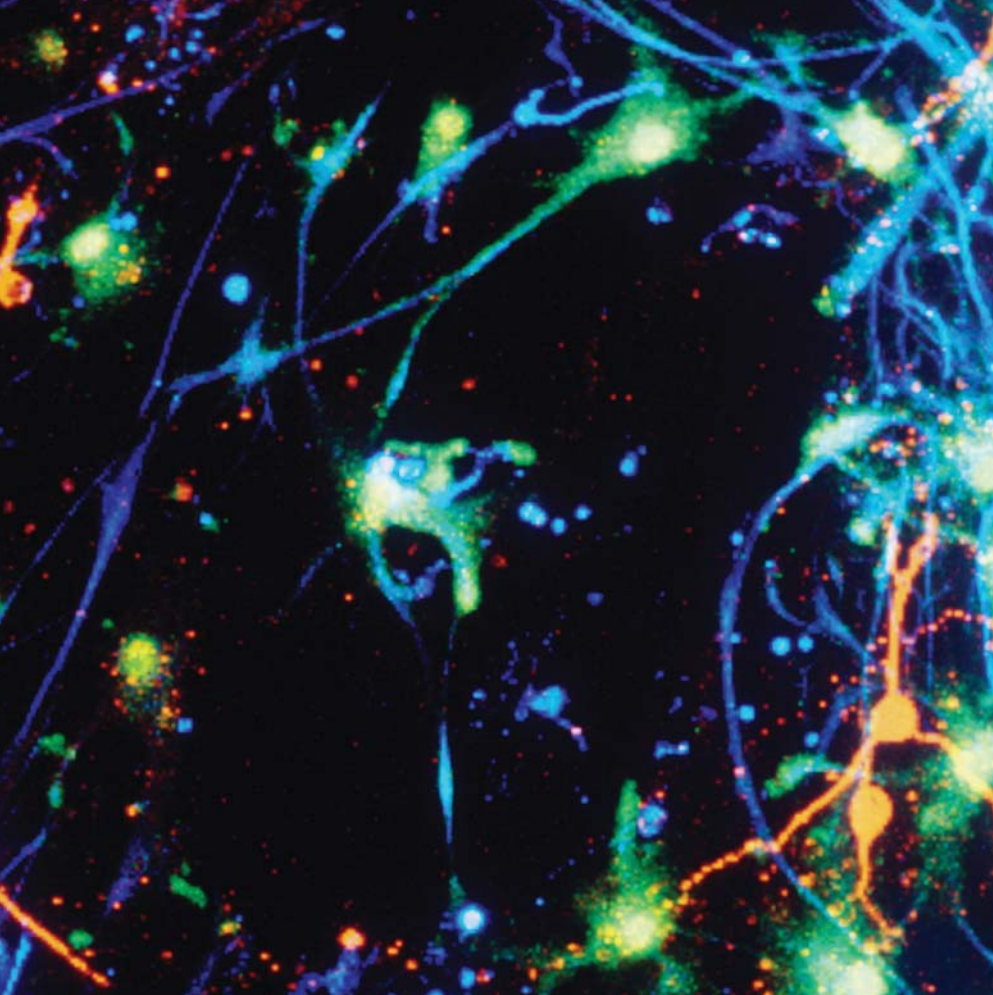
优生学的目标是以科学服务于对人类品种的改善，诚然，其淘汰“劣性”特征的特点，有点把人类放到了与牲畜类似的地位。在美国和英国，优生学往往基于阶级和特权，中上层阶级被认为是生物上具有优越性的。优生学在一段时间内是主流科学，受到科学人文主义者们的拥护，如关

亡、疾病和其它生物弱点，思想学派的总称。”

一些别的老例子还赋予科学以影响人类意义的力量。在十九世纪后期，儒勒·凡尔纳的科学浪漫小说²用想像创造的绝妙产

物，如深海潜艇和能到达月球的飞船等，表达了一种异常进步的科学观。科学让人类的想象力惊讶不已，并确立了世人对人类在道义和物质上不断进步的普遍信念。但在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人类想象力阴暗的一面。在美国，

1. 《弗兰肯斯坦，现代的普罗米修斯》，1818年出版，是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1797-1851年）最著名的作品。
2. 儒勒·凡尔纳（1828-1905年），法国作家，以其科幻作品《地心游记》（1864年）、《从地球到月球》（1865年）、《海底两万里》（1870年）和《八十天环游地球》（1873年）而闻名。



© Philippe Plailly / Eurelios / LookatSciences

↑显微镜下的干细胞，法国埃夫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注物种永生的伟大科幻小说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³。

完美科学家的肖像

其他科学人文主义者，如乔治·萨顿⁴，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则采取了更温和的方法（虽然还是精英论）。1918年，他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新人文主义》⁵中写道，科学是“国际永恒合作的产物，唯一有序的主体，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宝藏；事实上，是他们赖以享有平等权利的遗产”。对萨顿而言，人类的真正目的在于“创造新的价值观和文化价值；逐步揭示并展现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组织我们所说的艺术和科学”。科学再一次被赋予了高于价值和意义的力量。

另一位普救论者莫里斯·戈兰，1943年在《高等教育学报》杂志中描述了政治乌托邦的愿景，他心目中的完美科学家形象是：“他在任何时候都属于人

用科学造福世界，是与科学本身一样古老的项目。

类，服务于人类的价值观，永远对越轨行为保持警惕，维护社会的安定，反对暴政、不容异说和独裁……世界科学家只要威胁专制统治者，称不按照他们的命令从事，即可永远保证以和平方式解决世界问题。”这是成为哲学王的科学家，科学知识给了他权力和道德上的权威。

在20世纪70年代，当科学与人文主义在社会生物学上有了交

3.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年），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对读者而言，其闻名遐迩的作品有《时间机器》（1895年）、《隐身人》（1897年）和《星际战争》（1898年）。

4. 乔治·萨顿（1884-1956年），出生于比利时的美国历史学家，其主要著作是篇幅达三卷的《科学史导论》。

5. 该文章最初于1918年以法语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6. 乔治·帕金斯·马什（1801-1882年），美国外交官兼哲学家。

集的时候，它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在这门新学科中，进化理论被应用于解释动物和人类的社会行为。极端形式的生物决定论认为，社会现状是生物学的反映。实际上，社会被强迫成为当代科学的镜像。用生物决定论去解释非裔美国人男性的进攻性、女性的顺服，以及总体滞后的智商得分，这表现出毋庸置疑的种族不平等和非裔美国人低人一等的现实。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通过科普读物如《人的不可测量》（1981年）来反对决定论者。对古尔德而言，人类共享着共同的基因遗传，除此以外，存在着显著的社会和文化差异。

科学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它也不能告诉我们“更好”是什么样。

乔治·帕金斯·马什⁶是率先就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环境影响发出警告的人，这种影响从19世纪就已开始，他相信，科学和技术能解决人类所造成的问题，但是，在解决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在未来，我们需要科学与人文主义的合作。我们还应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不能期待科学为我们提供存在的终极意义。科学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它也不能告诉我们“更好”是什么样。科学是人创造的产物，而且从每一代人那里都获得新的意义和目的。我们作出的选择应以责任和德行为中心。■

米哈尔·迈耶出生于以色列。她曾在新西兰和斐济担任气象学家，在以色列当过记者。她持有科学史博士学位，自2009年9月为化学遗产基金会工作。她是《化学遗产杂志》（<http://www.chemheritage.org/discover/magazine/index.aspx>）的主编。

生物伦理学， 未知的挑战

面对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的主要困境，生物伦理学需要提出新的道德方面的解决方案，力求在获得这些学科潜在益处的同时，要有负责任的态度，并保持警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人文主义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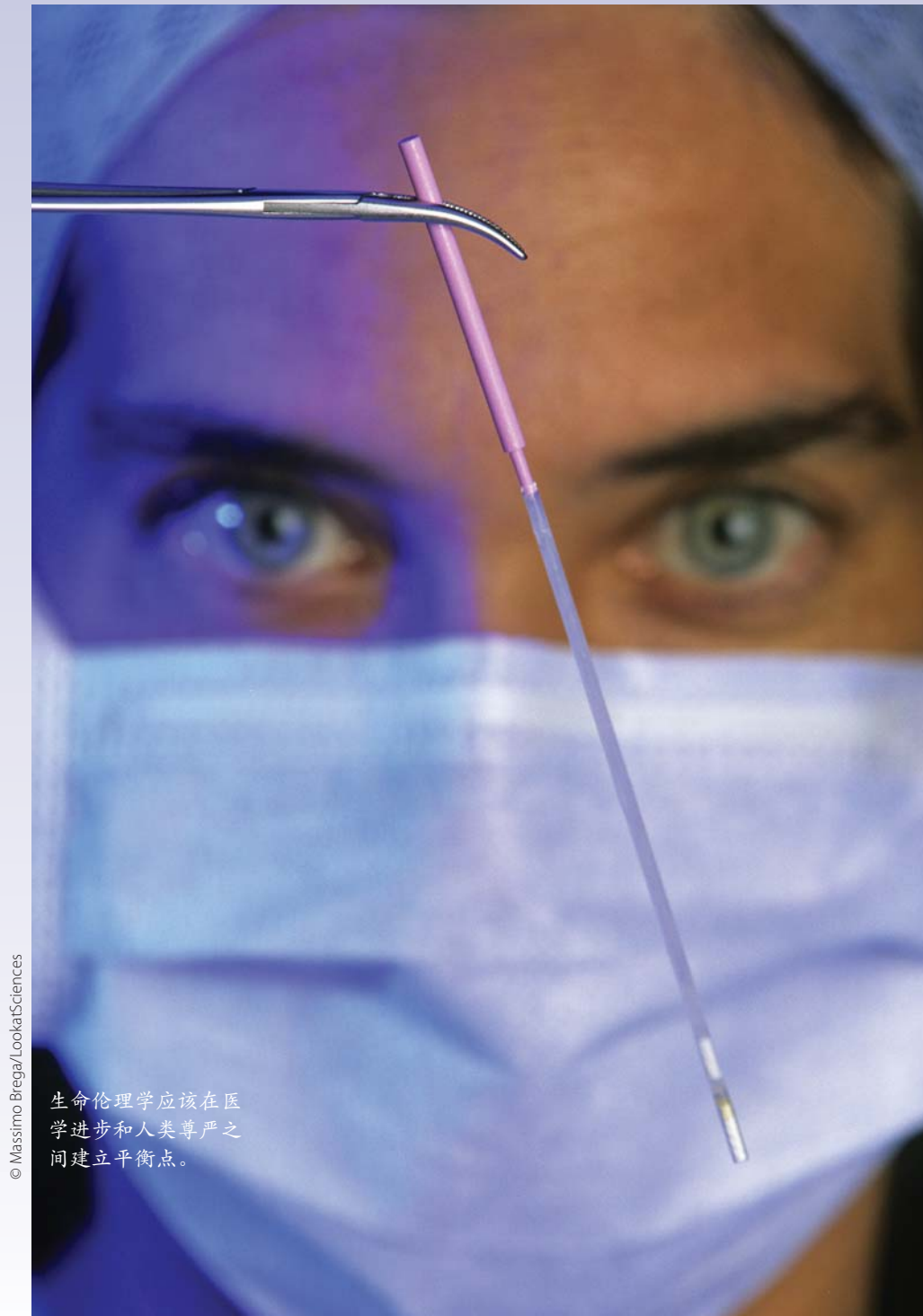
萨尔瓦多·德·伯杰

生物伦理学的兴起，并不是因为一些意外事件，或是有洞察力的思想家的灵感闪现。¹它的蓬勃发展可以从历史、科学和社会的角度来阐释。在过去五十年中，医药科学的惊人发展，为科研发展开辟了多种无法预料的研究方向。同时，它也为公众健康领域带来了进步。在伦理道德方面，也引发了意料之外的挑战。

在生物学和健康科学方面，每一个新突破，例如器官移植，拯救了无数的生命，或是辅助生育技术，解决了一些夫妻的生育问题。但是，这些同时也面临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障碍，引起宗教和道德上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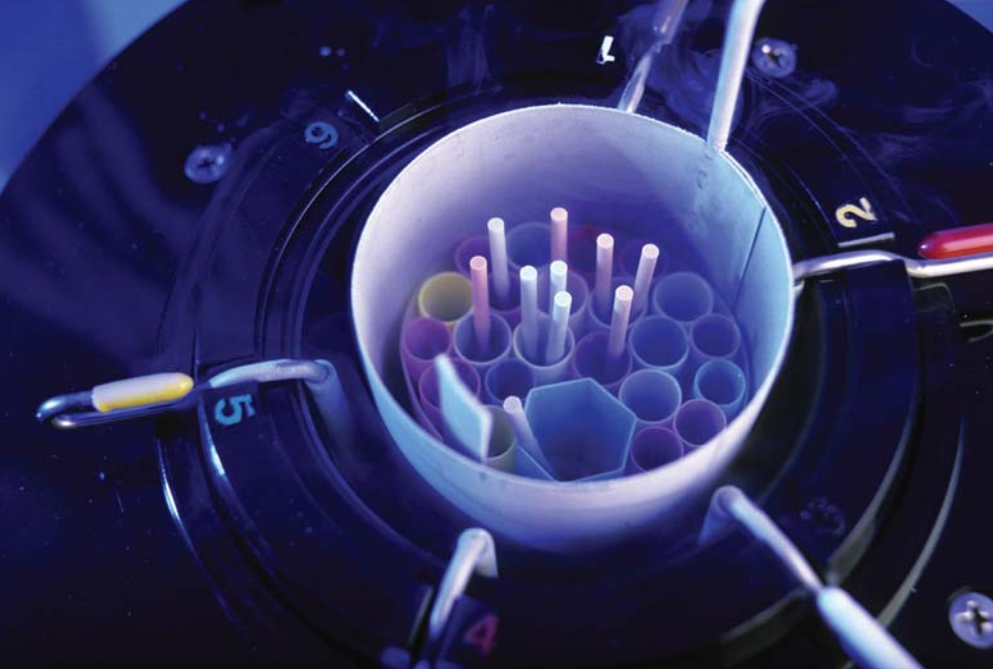
对于人类胚胎的研究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涉及生命的起源、道德概念、科学甚至经济利益，从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一种技术，让即将出生的婴儿避免无法医治的遗传性疾病）到干细胞的使用（可以转变成数种特化细胞，对再生医学的未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美国科学家·R·波特第一次使用“生物伦理学”的术语，并发表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



© Massimo Brega/LookatSciences

生命伦理学应该在医学进步和人类尊严之间建立平衡点。



© Massimo Brega/LookatSciences

↑ 瓶装液体氮，含有片状金，用于助产。

这些都不是孤立的或有限的探索。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真正的生物革命。在短短的数十年内，科学家们已经能够破译遗传的化学基础，以及所有生物共享的遗传代码，这为分子生物学和新的遗传学奠定了基础。这导致了基因工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技术科学”，能够操作基因，并在单物种间以及在不同物种间交换基因。人类现在可以为了实际的目的，操纵并修改遗传信息，甚至能根据自己的生物特质，把自己作为一个物种进行操作。从生物伦理学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最令人不安的一点。

这在生命科学上是个进步，促使我们思考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引发了超越科学的伦理、社会和法律方面的问题。这些需要生物伦理学在医学的进步与尊重人类生命间，寻找一个富有远见的、公平的平衡点。

生物伦理学必须认识到这些科学突破带来的好处，同时对可

能存在的风险和危险保持警惕。虽然科学的进步有望发展出新的治疗方法，用来根除长期影响人类健康的疾病。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担心其不良后果和可能的滥用，例如遗传操作以及各种应用，对弱势群体的试验，以及优生学的回归，现在对此有一系列复杂的工具可用。

生物伦理学的出现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²对战争的憎恶引起了普遍的抗议，一直等到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发布才得以平息。生物伦理学的首要目标是基于人文主义的原则，在生命科学不断演化的情况下，主张把人放在第一位，捍卫物种生来就有的尊严和自由。

对话、共识和宽容

生物伦理学无论从目标，还是从多领域的特性来看，都是人文主义的支柱。面对新的科学挑战，传统伦理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为了提供恰当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找到一个途径，能够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流，并以两者各自的方法和特有的观点，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融汇在一起，包括哲学、医学、生物学、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

生物伦理学也在其方法和实践中，融入了人文主义价值观。其目标是通过建设性的、理性的对话，与所有相关领域达成共

识。当面临危及生存和道德责任的选择时，社会不再满足于被动的对待。因此生物伦理学不得不采用开放的、包容的理念，实施的标准和法律要尊重多文化社团独特的传统和信仰。

但是，这些人文主义价值观不仅促进了理论思考，也应用到了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上，例如在医疗实践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该领域也扩展到社会的健康层面，例如贫困、食物、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医疗服务和药品。

通过国家伦理委员会和医院委员会的倡议，以及教学和研究，生物伦理学引起了全球性的争论。这场争论有助于帮助世界公平这一想法。应当指出的是，几乎无一例外，现在医学院的教学计划包括生物伦理学，显示了其在医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在每个健康机构，几乎都设立了医院生物伦理学委员会。每个国家都有国家伦理学委员会或起到同样作用的特设专家小组。解决生物伦理学问题的规则、标准和协议被广泛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反思和辩论的论坛——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并通过制定以人权为基础的指导方针，加强规范，最终制定了三个世界宣言。³

生物伦理学与人权的结合宣告新的人文主义形式的诞生，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期望和挑战一致。这种新的人文主义承认了人性中生物和伦理的部分，其尊严必须得到保障，并承担保护所有形式的生命的责任和义务。这同时也是为了子孙后代，保证物种的传承。■

萨尔瓦多·德·伯杰（阿根廷），持有法律学位，是生物伦理学的专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伦理学的主席。

2. 美国科学家·R·波特第一次使用“生物伦理学”的术语，并发表在1970年的一篇文章中。
3. 《人类基因宣言》（1997年）、《国际人类基因数据宣言》（2003年）和《生物伦理世界宣言》（2005年）。

人类 未来的七点建议

当今，价值已经转换为价格，树木加工成木材，或动物成为肉和皮革才有价值。根据克里斯多旺·布瓦尔克的观点，这是因为数百年来，人文主义发展迷失了方向。为了促使一种建立在现代道德基础上的新的人文主义形式的诞生，我们必须考虑到正在面临的全球性的挑战。

克里斯多旺·布瓦尔克

正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它是由传统的古希腊思想的复兴融合而形成的，并把人类放在首要位置，强调人类与自然界的其它生物不同，是独立的，占有主导地位的。这一理念不仅被广泛接受，人类的绝对主导和对自然的改造也巩固了这一说法。

在加强这一人文主义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非人文事件。原子弹本身是精神分裂式文明的标志。人类用自己创造的技术统治了自然，与此同时，人类也开始被技术所左右。这些技术已经定义了社会系统特性，正在摧毁环境，同时增加了社会不平等。

地球不确定的未来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反思人文主义计划。

对此，我认为人文主义计划必须建立在以下七大支柱上。

促进全球政治

当今，城市对于雅典人来说，就是现代民主的国家。由希腊人创立的公民意识是，城市居

本文是2010年5月，克里斯多旺·布瓦尔克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第三届文明联盟全球论坛上演讲文稿的摘录。

民对自己城市的责任转化成对整个国家的责任。

现在全球危机带给我们作为地球公民的责任上的问题。换句话说，要求个人承担起对人类和地球命运的责任。对于我来说，新的人文主义必须关注全人类的重要性和世界的团结。

尊重文化多样性

过去，人类歧视他的同类，正如对美国土著人进行的种族灭绝，非洲奴役和其它形式的种族主义以及排外主义，这些都为了显示一种优越感。新的人文主义必须摆脱民族优越感，必须是博爱的，并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必须平息文化间的冲突，把多样性作为高度文明的标志。而这些文化的相互交流不仅仅是各部分的汇总。

爱护环境

人文主义一直以来以一种不负责任的、自负的态度对待自然，认为自然毫无价值。人类耗尽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平衡，以至于文明的延续受到了威胁。在这个面临破坏的、毫无价值的地球上，只有人类劳动和市场设定的价格才能产生价值。树木的价值在木材中，动物的价值在其肉和皮革中。

我倡导的新的人文主义，应该寻求一种与环境平衡协调的文明。经济总量应该不仅由物质商品和服务的总量来衡量，也必须考虑到生产过程中的浪费所产生的全部成本。

保证机会均等

人文主义是实现平等梦想的绿洲，但是资本主义加大了不平等，使个人收入大大影响生活预期的差异。我梦想的人文主义确保平等的机会，是提高社会地位的阶梯，用生态准则界定消耗环

境资源的界限，同时保护弱势群体。

促进均衡生产

尊重工人而不是土地的想法，让人成为价值的产生者，并把工人作为生产过程的核心。但是当价值转换成由超越人为控制的市场决定的价格时，这个巨大的发展对人文主义却是不利的。辩解取代了公正，需求取代了意愿，消费欲望取代了需求的满足。为了建立新的人文主义，人类和国家的发展要符合生态平和的生产流程。同时，要评估非贸易物资的价值。

新的人文主义必须废除奴隶制。因为奴隶制在生产过程中把人禁锢起来，只把人当作一个零件来使用。

如今，在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经济的环境下，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关键取决于素质教育。

通过教育来融合

由于经济发展，工业时代的人文主义有望实现收入平等。资本主义说，生产的增长和市场法规会导致一个“涓滴效应”，也就是收入的分配是从社会金字塔的顶部到底部；而社会主义的分配是由国家和计划经济的法规保障。

如今，在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经济的环境下，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关键取决于素质教育。新人文主义面临的挑战是，确保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平等的、良好的教育，与种族、家庭收入或居住地无关。资本主义倡导的“涓滴效应”不再来自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教育带来的由下而上的改变。

这一过程的长期目标是，运用这个世界上所有可以利用的技术，将世界各地的人融合在一起。

道德技术的现代性

文明的工业化进程的特点是追求技术的现代性，采用最新技术。这需要在经济方面保持理性，用以辨别尖端技术产品，以及超越社会目标，但是由此也会降低道德价值。

新的人文主义必须用道德价值观建立社会目标，并把道德价值观作为经济方面的理性基础，用以定义所有技术的采用。甚至，技术的采用还要根据道德和审美标准，而不仅仅考虑经济效率。

由技术创新和人文主义定义的技术现代性，在新的人文主义中，将被伦理现代性所取代。例如，判断现代化的交通是根据其结果——减少路途时间，用户的舒适感，准时或便利性，而不是根据私家车流通的数量。

正如爱因斯坦试图与上帝对话，虽然他并不信仰上帝，还是尝试了解上帝是如何构造出世界所有细节的。新的人文主义必须找到理想的途径建立一种文明。这种文明对每个人都是民主的，包容的，有效的，并且尊重人性。唯一的途径是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进行对话。新的人文主义将促进各种文化与“地球母亲”间的交流。■

克里斯多旺·布瓦尔克：巴西参议员、巴西利亚大学教授，2003年任教育部长。他的政治生涯一直是致力于扫除文盲，推行土地改革，改善巴西健康系统和工作条件。



5月25日至28日，非洲周。

© UNESCO/Ania Freindorf



1月27日，让·马里·莱恩在国际化学年开幕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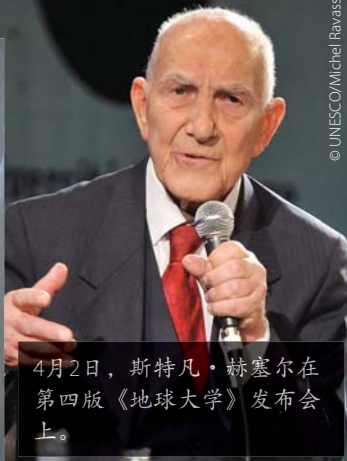
© UNESCO/Michel Ravassard

部
总
文
组
织
科
教
2011年



3月7日，克洛德·兰兹曼发布其电影《大屠杀》的波斯语版本。

© UNESCO/Danica Bijeljic



4月2日，斯特凡·赫塞尔在第四版《地球大学》发布会上。

© UNESCO/Michel Ravass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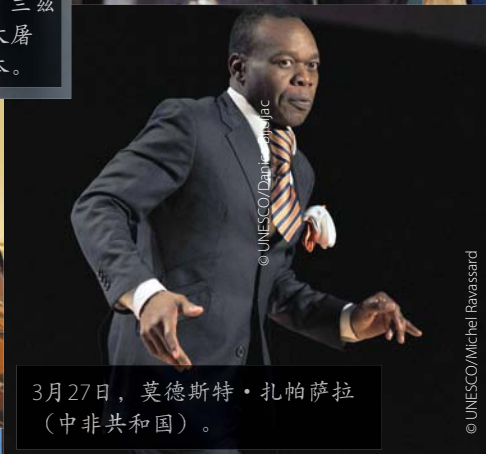
3月8日国际妇女节之际，伊琳娜·博科娃和泰国代表团成员。

© UNESCO/Michel Ravassard



1月24日，玻利维亚阿拉斯塔节仪式。

© UNESCO/Michel Ravassard



3月27日，莫德斯特·扎帕萨拉（中非共和国）。

© UNESCO/Danica Bijeljic



1月21日，海地大地震一年后。阿莫斯·古朗基。

© UNESCO/Danica Bijeljic



1月26日，智利莫尼卡·冈扎勒·穆希卡。

© UNESCO/Danica Bijeljic



7月29日，佐尔坦·柯达伊乐队向李斯特致敬。

© UNESCO/Ania Freindorf



3月22日下午，和航天员在一起。

© UNESCO/Danica Bijeljic



2月21日，咪咪·巴特莱米（海地）将新书献给儿童。

© UNESCO/Danica Bijeljic



3月2日，教科文组织—欧莱雅获奖者们。

© UNESCO/Michel Ravassard



儿童兵， 面临的新生活

最近荣获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称号的美国演员和导演福里斯特·惠特克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兵保护事业中。他致力于这项事业，创造了大量机会，以帮助儿童兵表达心声、返回被驱逐的社区、获得教育、原谅自己、重拾自尊。

福里斯特·惠特克回答卡捷琳娜·马可洛娃的提问

2008年由您担任执行制片人的电影《卡西姆之梦》，影片中的英雄是个无法原谅自己罪行的前儿童兵。他是谁？

乌干达青年卡西姆的悲惨故事具有象征意义。这是个讲述一个神奇男人的故事，一个伟大的拳击手，本世纪开头几年在中量级领域很有名。他已经快要成功……直到过去的恶魔擒获了他。正在全力准备世界锦标赛之际，他离开了擂台。由于内心备受折磨，他去了乌干达。影片

中，我们看到他在父亲的坟墓前冥想。他的父亲由于他而被害。卡西姆体现了失去自尊这一致命损失。他无法和使他成为儿童兵的世界调和，也无法和自己调和。

在您碰到的儿童兵中，是否有很多人做到了自我谅解？

没有。相反，我知道很多人晚上做恶梦。犯下暴行后，他们以某种方式原谅自己，但做不到完全原谅。对他们来说，最难的是重新融入抛弃他们的社区，就

←福里斯特·惠特克在教科文组织，2011年6月。

算有时他们没有对社区成员有过暴力行为——更何况有过时。尽管我们都知道儿童兵是被强行招募，被迫杀人，但在社会看来，凶手就是凶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做到谅解呢？怎样治疗如此的创伤呢？这需要非凡的努力。这些年轻人必须找到能使自己完全投入的事情做。否则，他们将很难摆脱阴影。

此外，我坚信，如果我们提供良好的教育，他们是能脱离这种状况的。教育，意味着开放思想，向每个人展现机会。教育有助于理解，有助于产生同情。而同情又会导致谅解，谅解又会产生爱：爱自己，爱他人。这是我们帮助儿童兵时的路径。对一些儿童兵来说，效果不错。

您为何从事儿童兵这项事业？

五年前，我在乌干达和一些儿童兵开始我的项目。此前，我在非洲防治疟疾领域工作过，也曾和一些打击暴力的协会工作过。我还关注过美国流氓帮现象——美国流氓帮和非洲儿童兵有相似之处。

我不把这些年轻人和世界分离开，我认为他们是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我深信，我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原始实体，都渴望团结一致，重建这个实体。对于我来说，试着理解并帮助流氓帮的年轻人和儿童兵不仅仅是智力选择、情感选择，也是心灵选择。这不需要解释和理由，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是我看待宇宙、感知上帝的方式。

↓儿童兵和他的家人。2004年，安哥拉。

您认为美国的流氓帮和非洲的内战有何相似之处？

这正是我目前在拍摄的纪录片《共同的命运》中说明的问题。我们采访了一个乌干达儿童兵和洛杉矶流氓帮血帮的成员。我们将两者进行比较，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是被迫进入暴力世界的，都攻击所在社区的人们。

作为一个孩子，我亲眼目睹了美国流氓帮，尤其是洛杉矶克里普斯帮和血帮的诞生。从他们出现到成为国际团伙，我一直在观察他们。我小时候住在绿街区，即克里普斯帮地盘，我的一个表兄弟住在红街区，即血帮地盘，而他加入了血帮。如果当时我加入了绿街区的流氓帮，那我们俩就成为敌人，可能自相残杀。在非洲的冲突地区，武装叛

© UN Photo/Chris Sattlberger



乱分子绑架小孩充当士兵，一些小表兄弟们不也因此而成为敌人？

由此可见，流氓帮和儿童兵之间确实存在着关联。他们混在（有时并不可见）走私、毒品和武器贩卖的幕后。

在《共同的命运》中，您将展示给遭受冲突蹂躏的社区带去和平机制。您怎么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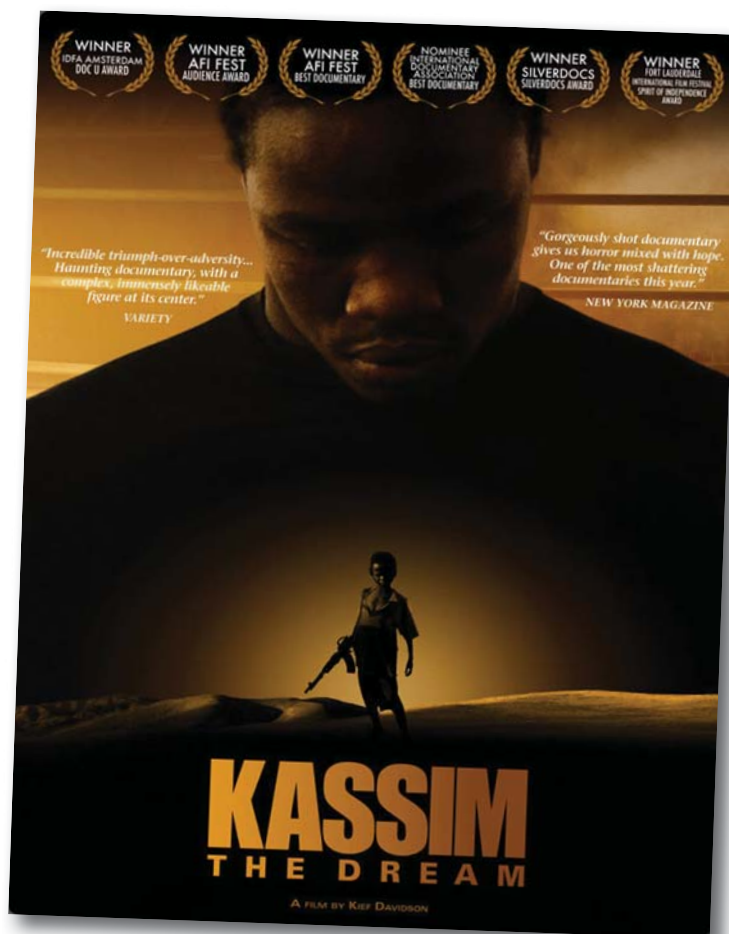
我们将跟踪生活在受武装冲突蹂躏地区的人。在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我们将分析他们的轨迹、斗争和成功。我们还将就和平对这些人的意义为主题进行访谈，并和政治决策人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进行谈话。这部纪录片能使相关人员有机会发表意见，同时提供关于如何实现和平的例子。

我们尚未决定前往哪些国家，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不久前我们也在这里，在教科文组织谈论了。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将会研究和环境、移民、仇外等问题有关的不同类型的冲突。我将花大约两年的时间在这个项目上。

在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这一新使命的框架里，您还有其它计划吗？

有好几个。其中之一是和解决冲突有关的青年培训项目。我们将帮助儿童难民返回故国，培训一些人员给他们提供支持。我们还将创立一个网站，以便让他们和世界上其他人及彼此之间相互联系。

此外，我成立的公司正在制作不少于六部的纪录片，大部分以和平、和解为主题。我们还与法国公司37工作室合作拍摄一部虚构电影《更好的天使》，也是同类主题。电影主角是个战地记者，他去乌干达采访上帝抵抗军



© A Believe Media and Urban Landscapes film production

↑电影《卡西姆之梦》海报。福里斯特·惠特克担任制片人，2008年。

领导人科尼。这支部队部分由儿童兵组成。

您担任记者，对吧？

是的。几个月前我们去了乌干达，以便深化研究，采访士兵，确保电影里讲的故事符合事实。同时，我们在进行一项有关

同情、同情的真实含义的工作。另外，我们刚刚开始拍摄一部关于一个卢旺达自行车赛手的纪录片。该赛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内战中饱受折磨。这部片子具有乐观色彩。别忘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将首次迎来一个卢旺达自行车赛手。■

全球有250000 儿童兵

根据联合国2010年出版的一份报告，全球约有25万儿童被叛乱团体或军队招募。然而，去年儿童兵的复员工作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主要是在菲律宾、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南部、斯里兰卡和布隆迪，儿童兵得以复员并重新融入社会。在同份报告中，联合国明确指出没有关于在冲突中死亡的全球儿童兵统计数字。

对于民兵和其它叛乱组织来说，儿童易获又有用。对儿童进行思想灌输并让他们冒更大的风险并不难，有时甚至可以让他们承担比成年人更残忍的暴行。作为孩子，他们觉得必须服从大人的命令。他吸人们给他的毒品，比成人没有判断力。关于这个主题，刚果前儿童兵、今日艺术家赛尔日·阿米斯是个醒目的见证。《教科文组织信使》2011年7月—9月刊出版了一篇赛尔日·阿米斯的文章。

2010年是《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通过十周年。到目前为止，有132个国家批准了任择议定书，24个国家签署，36个国家既未签署也未批准。-- 雅斯米娜·萨波瓦

《赛尔日·阿米斯的神奇武器》全文：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9/001937/193773C.pdf#page=20>

想象力的特别空间



画家、雕塑家帕特里克·梅德拉诺和摄影师凯蒂·安德森的作品《诗书》。这两位艺术家共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工作。

© Patrick Medrano & Katy Anderson
www.katyanderson.com; www.patrickmedrano.com

在这21世纪初期，网上的虚拟图书馆蓬勃兴起，电子书飞速发展。这些新媒体是否会废黜纸张国王吗？要知道，直至今日，纸张可是王国里唯一的主宰者。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童年时代的收音机经历使其成为作家，他打赌说，“传统”书籍会抵制住数字狂热的。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我崇拜书籍，就像崇拜镌刻在洞穴岩壁和祖先羊皮纸上的已逝文化那样，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当代作家中少数不憎恨电视的人之一。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制作的电视节目——靠的主要

是我的想象力而不是资金——在深夜播出，并多次被列入拉丁美洲转播的收视率最高的十大节目排行榜中。

这并不仅仅因为魔幻现实主义精神——魔幻现实主义是拉美文学的主要特征，其教父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布里尔·加西亚·

马尔克斯¹——而是因为从儿童时期就获得的深刻信念，即：书本

1. 哥伦比亚作家，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本文摘录自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在意大利蒙扎举行的第二届全球文化和文化产业论坛（2011年6月6日至8日）上的发言稿。



↑多米尼克·曼特尔之画《书箱》。

故事用语言讲述出来时给人的喜悦闪烁着更为耀眼的光芒。我的这一信念不是从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²或福柯³的书上来的，而是来源于我八岁时和祖母一起度过的质朴乡村生活，来源于十一、二岁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街区的伙伴们。

我记得午饭后，当祖母坐下来编织她永远也织不完的开衫时，总是叫我留在她身边，一起收听收音机上配有悲伤音乐的恐怖情节剧。祖母对这些连续剧是如此喜爱，以至于如果有人问她个问题，或电话铃响了，她就会生气。她愤怒地评论主角，认为其愚蠢，采取行动不及她果断。

我对一部连续剧记忆犹新。剧中的两个强盗企图偷窃一个贵族价值百万美元的钻戒，但一集又一集过去了，他们的企图总是无法得逞。每当即将到手的时候，总要发生一件事情：女佣进房间来了；丈夫过来拥抱她；女士关上卫生间洗澡……。有一天，他们在她的汤里放了安眠药，她晕倒在地，他们试图拿走她的戒指，但戒指是如此之紧，他们取不下来，白费了十分钟之后，只好逃走。祖母大怒，用克罗地亚口音的西班牙语说：“蠢货！带把斧子，把那女人的手指砍下来，连同戒指一起带走不就行了！”我的祖母是个感情强烈的女人。

作家之路的起步

村子里电力不足。由于经常拉闸限电，收音机无法一直播放，有时故事讲到高潮就停电了。碰到这种情况，祖母总是骂骂咧咧。又一次，她转向我，说：“这样吧，安东尼奥，你说说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就充分使用想象力，连带手势、气喘吁吁地给她讲故事，情节细致入微，就像她喜欢的那样。祖母点着头，继续手里的活，眼睛紧紧盯着天花板，好像那里正在发生我给她讲述的故事。

一个星期六，没有停电，收音机正大声播讲着情节剧。祖母却关了收音机，对我说：“安东尼奥，我更喜欢你讲。”我想，正是这件事把我引上了专业作家之路：没有任何媒介！

正如您所知，满足一个祖母的虚构愿望是弥补作家脆弱条件的极佳请柬。对我来说，祖母对我所讲的“补充”部分的赞赏比哈佛“创意写作”博士学位更鼓舞人心。

在那个时代，对于智利的青少年来说，所谓作家，肯定是北美作家。并且是在纽约！登上帝国大厦的阳台，手中搂着一位金发女郎，就像金刚那样。在纽约那个全球大都市，能找到

所有令人兴奋的东西。应该《开路》，应该像凯鲁亚克⁴和“垮掉的一代”诗人们那样生活《在路上》。

作为作家，我是在没有任何物质媒介（也许除了人的声音，还有沙漠的寂静）的情况下爱上文学的。因此，我对虚构故事降落在哪个机场毫不关心。我认为，文学的问题不在于媒介，而在于缺少读者。我之所以盛赞纸质书，是因为它作为载体，给我带来了三十多种不同语种的读者。由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甚至歌剧也是如此。

我并不害怕改变。相反，我赞赏它，我使用它。我知道，不管媒介为何，邮递员送给巴勃鲁·聂鲁达⁵的我的信，在纸质书、iPad和电子书的读者，和电影院、剧场的观众中唤起的感情是一样的。

文学远不止是信息

我查阅了电子书读者的数量，发现至今为止，我的母语卡斯蒂利亚语市场远远低于英语市场。

但是，我也想告诉您：文学的纸质媒介，也就是纸质书，是如此优美，因此至少在美术领域，将与新媒介共存。我甚至认为，纸质书会从中得益。我这么

认为是有理由的：屏幕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工作工具。

不管身处何地，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或多或少刺耳的快闪（其程度取决于电脑质量）中度过的。电子和我们的工作息息相关。它增加我们的视野，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是它控制我们。

当然，它也是需要交流的人们之间一个特定空间。同样有趣的是，网上冲浪者之间使用的最流行表达方式是简写邮件，简洁、微小。这就是信息。推特网。

我知道，不管媒介为何，邮递员送给巴勃鲁·聂鲁达的我的信，在纸质书、iPad和电子书的读者，以及电影院、剧场的观众中唤起的感情是一样的。

但是，恰恰需要指出的是，文学远不止信息。一部科学作品是一处信息矿，研究性书籍仅包含信息，需要理解、学习、掌握和应运的信息。

文学与实用主义标准不沾边，文学是有关文字和图像的乐趣。这些文字和图像带领灵魂进入非科学语言统治的地区。简而言之，文学创作、朗诵和诗歌属于乐趣范畴，而不是工作范畴。

我认为“散心”这一心理因素将保护书籍不被信息的贪婪吞噬，包括信息的提供者到信息的需求者。我们当然可以买张碟片，在电视机屏幕前看最新的戛纳奖影片，但我们继续去电影院：我们当然非常虔诚，总是用祈祷和上帝进行亲密对话，但我们还是去寺庙，参加仪式；我们当然可以通过电话或邮件向所爱之人表达爱慕，但我们总是寻找找到她，亲吻她，不光是她的

嘴唇；我们当然可以整天目不转睛地盯着华尔街的股票交易，晚上再去看一部绝佳的三维电影，欣赏塔希提沙滩和高更画笔下的美景，但我们真正想要的是身处沙滩，欣赏肌肤，享受微风。不要替代的乐趣，而要真正活在其中，在天蓝色的温暖海水中游泳。

不同媒介的合理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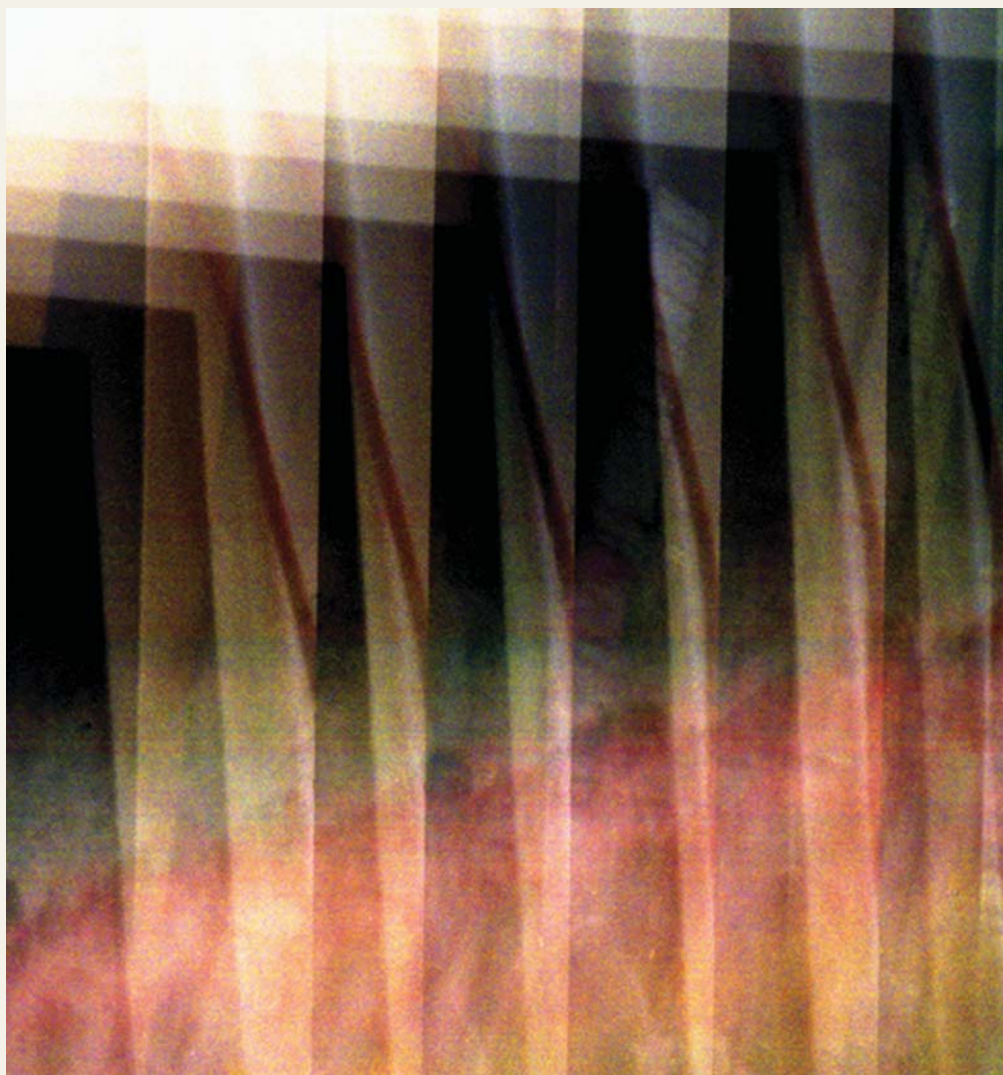
我们就书籍的未来进行讨论时应该记住，书写在纸张上的文稿——从古老的羊皮纸文稿到现在的印刷品——创造了奇妙的交流空间，诸如书店、国家图书馆、市政图书馆、读者俱乐部。它又和其它艺术相结合，使得印刷装订好的文稿成为独特的物品——它有书写、插图、封面、

和在公共场所聚集在其身边的人们。

一本好书的出版立即引起集体仰慕，这是文化事件。我想，

2. 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1908年-2009年），法国人类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3. 米歇尔·福柯（1926年-1984年），法国哲学家，法兰西公学院教授。
4. 杰克·凯鲁亚克（1922年-1969年），美国作家，其主要作品有《在路上》，属于“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指的是一群青年作家，他们反对追求物质享受、虚伪、肤浅的社会。
5. 巴勃鲁·聂鲁达（1904年-1973年），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斯卡尔梅达在小说《燃烧的耐心》中，讲述了黑岛上的邮递员马力欧·基莫内的故事。巴勃鲁·聂鲁达是马力欧·基莫内在黑岛上的唯一客户，前者为了安心创作，曾在岛上避难。

↓美国艺术家露丝·兰兹的作品《闪烁超绝》。



© Ruth Lantz - <http://local-artists.org/users/ruth-lantz>



© Saullius Valius/UNESCO

↑2004年1月，立陶宛造型艺术家索柳斯·瓦柳斯在教科文组织短期展出《打开的书籍》。

在孤单的数字空间上发表，这种不见天日的“鬼故事”的发表，永远也无法吸引和纸质书同等的热情关注。

我们在家坐在电视机前时，有众多语种的不同节目供我们观看，换频道的遥控器可以把我们带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但我们选择的第一个频道往往是本地新闻。本地新闻中出现的熟人和当地事件给我们一种亲切感和从属感，它们构成了我们日常谈话和辩论的原材料。

我看不出一本电子书能获得出版业严密结构与其发行网络（从书店到媒体）的同时钦慕和集体注意之光环。也就是说，根据现有模式出版一本书是文化事件，它将作家的幻想这一古怪的想象力列入人们的集体日程。

纸质媒体仍是非实用想象力、不同艺术相互结合的特别空间。

所以我打赌未来将是不同媒介的集体大共存。数字媒体将是研究、信息、智力“工作”、和“孤单”地与故事接触的忠实盟友；纸质媒体仍是非实用想象力、不同艺术相互结合的特别空间。

至于最忠实于全球文化的机构开始创立虚拟图书馆这一崇高工作，当然值得人们赞美。虚拟图书馆将人类自有文字以来的辉煌知识呈现给人们，标志着这些信息将在千百万人中间传播并影响他们，使他们更加明智，更加敏感，并因此更加自由。我们对之欢欣鼓舞。

为了使纸质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并和网上快速传播的作品和电子书共存，大的图书流通领域应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舒适。如果我们喜爱一本书，通常我们想把它送给一个人。这时，纸质书是最好不过了。我们都知道：电影没有消灭戏剧，电视没有消灭电影，精美的复制品没有消灭博物馆和原作……。我还有加上一句，在我阅读过的不同语言、走过的不同地方中，我发现人们渴望亲近感，渴望亲近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渴望逃离咆哮和尖叫，渴望直接生活在事件中心。人们希望避开中间媒介。有人会说这种趋势微不足道，但我说它会增长的。

有人说，图书与读者的沟通更为亲密，媒介较少。这是对的——我们不需要点击鼠标就能沉浸其中。但愿我们最亲爱的梦想就是这种与艺术、与艺术家的亲密感，与宁静的亲密感——我们进入创造王国，带回受到启发的生活方式、更多愉悦和趣味时的宁静。

今天，图书仍是最亲密的媒介，最不昙花一现、最具体、最感性、最有远见、甚至散发着最奇妙的香味——纸上的油墨清香。■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智利作家，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裔。1973年到1989年期间，他流亡于阿根廷和德国，2000年出任智利驻德大使。他的主要作品有：《圣·克里斯陀巴尔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门槛出版社，2002年）、《燃烧的耐心》（门槛出版社，2005年）、《你没死！》（门槛出版社，2007年）。青少年文学作品《编辑》（最新版本：西罗斯出版社，2007年）为其赢得了2002年教科文组织关于宽容的青少年书籍奖。

普鲁登斯的 飞翔

© Jennifer Koskinen

↑ 2010年7月，普鲁登斯在Mountainfilm电影节上。

普鲁登斯·玛比纳失去了双腿，但音乐赋予了她翅膀。通过歌唱，这位22岁的津巴布韦姑娘克服了人生旅程中阻碍她前进的重重障碍：先天性疾病、双腿截肢、家庭排斥、歧视和贫困。她与其他七名遭遇类似命运的青年一起，创立了“雨”乐队，她的故事激发了美国电影导演罗杰·罗斯·威廉斯的灵感去拍摄获得2010年奥斯卡获奖的短片《普鲁登斯的音乐》。罗杰讲述了他与普鲁登斯偶遇的故事，这场偶遇改变了他的生活。

罗杰·罗斯·威廉斯向凯茜·诺兰讲述普鲁登斯的故事

您是怎么遇见普鲁登斯的？

关于她的故事是一位纽约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听说后就写信给津巴布韦布拉瓦约市的国王乔治六世学校，向他们了解普鲁登斯照顾残障儿童的情况。该校的女校长给我发来了普鲁登斯乐队演出的一些片段，以及普鲁登斯亲自讲述其人生故事的一份三页文档。看了让人揪心。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的故事！然而，同时又那样地充满希望！我在那时

拍板决定制作我的第一部独立纪录片。

几个月后，2008年圣诞节那天，我已身处津巴布韦。在那里，我对普鲁登斯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跟踪拍摄。当我回到美国，看着所拍的镜头，我心想：“我发现了一位真正的明星。”

普鲁登斯愿意与您合作吗？

我花了一些力气说服普鲁登斯。她不相信我真地会出现在她

眼前，因为她已经习惯了生活中的背叛和失望。所以，她见到我的时候很惊讶。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充满了强烈的感情和激昂的情绪。从来没有人请普鲁登斯讲述过她的故事。那就像一次心理治疗。随着倾诉的话语奔涌而出，她泪如雨下。我流泪了，摄像师也流泪了。那时，我知道这将是我最重要的故事之一。



←2010年12月，罗杰·罗斯·威廉斯在《教科文组织信使》编辑部。

拨动了我的心弦。我也同样曾被我的父亲抛弃，虽然与普鲁登斯的程度不同。我们大家都钦佩那些成功战胜苦难的人们。普鲁登斯做到了。今天，她通过她的歌曲表达了一个响亮和明确的信号“永远不要放弃”。她总是很有决心，并深信有一天生活会变得更好。她认为人的一生只有经历磨难，才会欣赏所拥有的东西。

而您的电影表明，被抛弃的人们可以有非凡的天赋与人分享。

残障儿童，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女孩，处于啄食顺序的底端，很少有人会为他们支付学费。然而，每一个被抛弃和逐出的残障儿童都代表着萌芽的潜力。他们可能会成长为歌手、作家、甚至是美国总统！

普鲁登斯获得奥斯卡奖之后在做什么呢？

我帮她与人权观察组织和几个支持残障人士的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联系。她正周游世界，接受作为这项事业代言人的培训。

遇见普鲁登斯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对我有巨大影响。认识普鲁登斯使我意识到自己的各种抱怨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普鲁登斯从不抱怨。这使我摆正了对生活的态度。我对我生活中所拥有的和顺利得到的一切更加感恩。当然，遇见普鲁登斯已经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说的不只是奥斯卡奖。我的意思是，这部电影给我的工作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这是一个为世界做一些好事的机会。很可能，它将激励各个国家、各个家庭以及每个人去充分认识残障人士。■

访问普鲁登斯·玛比纳的网站：<http://www.musicbyprudence.com/>

我决心尽力成就这部影片，但遇到了许多“路障”。在津巴布韦拍电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挑战。停电经常发生，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摄像机和投影仪充满电。而更糟糕的是，津巴布韦是真地不允许在境内拍摄。我运气还不错，没有在津巴布韦竞选期间被捕或者被枪杀——那是一段充满暴力的时期。好几次，我们几乎要被驱逐出境了，在移民办事处我不得不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移民官让我们留下来。话说回来，我们只是在普鲁登斯的世界，一所残障儿童学校，进行拍摄。我们所做的事与政治无关，政府当局知道这一点。

这部电影怎样改变了普鲁登斯的生活？

之前，普鲁登斯已经是社区里的明星，她在城里各种音乐会上进行表演。但是，她在津巴布韦的其它地区并没有知名度。现在，她肯定是津巴布韦最有名的女性之一。在影片获得奥斯卡奖之后，她返回津巴布韦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象到会发生什么。飞机降落后，她看到了来自非洲各地的几百人和数十家媒体，以及布拉瓦约市市长都等着欢迎她。当她被抬下飞机，发现她的父亲正跪在飞机舷梯旁，泪流满面，乞求她的宽恕。

当时，市长宣布，“普鲁登斯·玛比纳告诉我们所有津巴布韦人，残障并不意味着无能，我们必须改变对待残障人士的态度。”这一说法在新闻报刊上得到了共鸣，它们赞扬普鲁登斯为国扬名。有一篇引人注目的头版新闻标题是“普鲁登斯为津巴布韦带来了奥斯卡金奖”。我不知道对残障人士的政治心态是否会有所改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普鲁登斯感动了许多人的心。

是什么引起您对残疾主题的关注？

我常常想到那些边缘人，被撇下、被遗忘的人。我认为自己是少数派，我一直这样认为。主要原因是通常我自己就是一个边缘人。因此，普鲁登斯的故事



俄罗斯歌手 阿尔苏·阿布拉 莫娃

被任命为教科文组织 和平艺术家

为了表彰28岁的俄罗斯歌手阿尔苏·阿布拉莫娃致力于帮助世界上最弱势群体，教科文组织于7月7日在巴黎总部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任命她为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

她的彩虹基金会帮助整修学校和医院，并帮助建立教堂和清真寺，还资助了一些孤儿院。

作为和平艺术家，阿尔苏将更加关注教育，投入到帮助儿童、建立孤儿院的事业中。

出生于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阿尔苏15岁时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阿尔苏》，并赢得了俄罗斯音乐界的认可。一年后，她代表俄罗斯参加在斯德哥尔摩（瑞典）举办的欧洲歌唱大赛，并荣获第二名。

阿尔苏加入到和平艺术家的行列之中，这些杰出的艺术家中有歌手、作曲家、钢琴家和演员，包括加拿大的席琳·迪翁、阿塞拜疆的法兰兹·阿里-萨德和黎巴嫩马塞尔·哈利法。获得这一称号的国际知名人士与教科文组织有相同的理念。■

“五月广场祖母协会” 在教科文组织总部领取博瓦尼 和平奖

阿根廷非政府组织“五月广场祖母协会”的主席伊斯拉·德·卡·托，9月14日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代表该组织领取了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该奖项包括15万美元、一枚金牌和一张和平证书。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科特迪瓦总统阿拉萨内·瓦塔拉、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和毛里塔尼亚总统穆罕默德·乌尔德·阿卜杜勒·阿齐兹出席了颁奖仪式。

“五月广场祖母协会”获得这一荣誉，是因为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保障和促进人权。从1977年成立起，该组织就帮助寻找在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遭受政治压迫而被绑架“失踪”的儿童家庭。

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设立了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每年颁发给个人、团体或机构，表彰他们为推广、研究、维护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

教科文组织与日本 合作共同援助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特大洪水造成的巨大灾害促使教科文组织于2011年7月与日本政府合作，发起了一个更新巴基斯坦洪水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项目，并针对印度河流域容易发生洪水的地区绘制更加详细的地图。这个项目是在巴基斯坦政府、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的支持下，由教科文组织的科学部门实施的。

在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国际水灾害与风险管理中心的专家也为这个项目做出了贡献。他们开发出的洪水径流分析系统，对在发展中国家今后可能发生的洪水灾难做出更加及时和准确的预报。

2010年7月底巴基斯坦发生了该国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使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信德省、旁遮普省和俾路支省大部分地区洪水泛滥。■



© Málaga Club de Fútbol



© UNESCO/Ania Freindorf

通过运动促进和平

2011年7月20日，在玛贝拉足球中心，马拉加足球俱乐部成员穿着印有教科文组织标识的球衣与卡塔尔-阿尔拉扬体育俱乐部进行第一场比赛。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博科娃与西班牙马拉加足球俱乐部主席谢赫·阿卜杜拉·阿勒萨尼在西班牙马拉加的毕加索博物馆签署了一项为期四年的协议，旨在通过体育、互联网及社交网络促进和平文化的建设。

教科文组织与马拉加足球俱乐部的代表将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制定促成目标达成的行动计划。马拉加足球俱乐部青年球员培训中心“足球学院”将成为执行协议的一块实验基地，以激发年轻人用新的方式思考和平。目前，有15支6至19岁的青少年球员组成的球队，即500名青少年球员在此接受训练。■

详情请见马拉加足球俱乐部的网站：<http://malagacf.com/?home>

爵士乐 传奇人物 赫比·汉考克 被任命为教科文组织 亲善大使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2011年7月22日在巴黎总部举行的一个仪式上，任命美国爵士音乐家赫比·汉考克为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总干事博科娃指出，这一任命是为了表彰汉考克致力于“通过对话、文化和艺术促进和平”。

赫比·汉考克在仪式上的访谈中说：“我获取信息，我投票，我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我和别人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证明我的生活是合理的，而唯一的理由是投身到为人类服务的事业中。”

现已71岁的美国著名爵士音乐家赫比·汉考克出生于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州，7岁就开始接受古典音乐教育。拥有超过50年的艺术生涯，他曾14次荣获格莱美音乐奖。他不仅是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还是60年代流行音乐运动的重要人物。■

数字时代的人文主义

2011年11月14日、15日，西班牙常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将在总部举行以“新人文主义是否能应对今天的科学和文化挑战？”为主题的会议。包括西班牙文化部长安吉拉·龚扎雷·辛德、智利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意大利作家罗伯托·托斯卡诺、法国哲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瓦和罗

热-保尔·德鲁瓦、西班牙哲学家阿德拉·科尔蒂娜和维克多·戈麦斯·平、塞内加尔作家法图·迪奥姆在内的三十多名作家、记者、科学家和专家将出席会议。■

如需获取等多信息，请联系：
dl.spain@unesco-delegations.org
电话：(+ 33 1) 4568 3385。



《2010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普及到边缘化群体》

报告指出，自国际社会2000年在达喀尔通过全民教育目标至今十年已逝，期间虽然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是许多贫穷国家并没有步入实现2015年目标的轨道。特别是没有普及到边缘化群体这一事实剥夺了許多人受教育的权利。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尚未消散，而过去十年所取得的许多进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危险也已悄然出现。教育面临险境，各国必须制订包容性更强的措施和更为广泛的战略，普及到边缘化群体，消除不平等，从而在2015年实现全民教育目标。 ■ 2010

《2011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潜在危机：武装冲突与教育》

世界仍未走上在2015年实现全民教育目标的轨道。虽然我们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2011年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传递的核心信息是，大部分目标还远远无法实现。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面临着特别严峻的挑战。各国政府需要有更强的紧迫感、更大的决心和共同的目标，使这些全民教育目标有可能得以实现。 ■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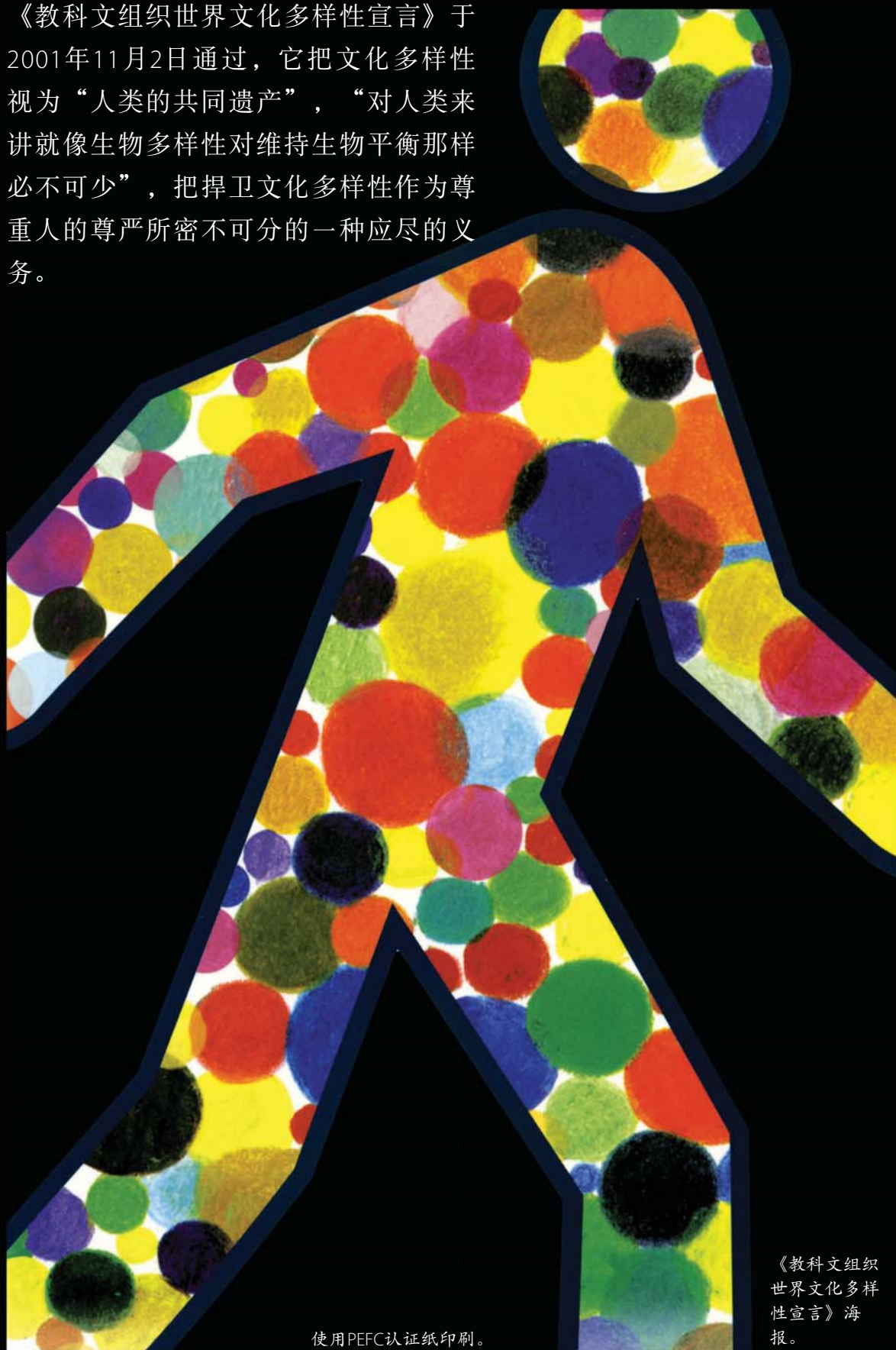
《投资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

鉴于全球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多种文化交流，对文化多样性的投资可以更新我们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确保有效行使普遍公认的人权和自由，加强社会凝聚力和民主治理。该报告分析了文化多样性的所有方面，它已成为国际社会在最近几十年关注的重要问题，报告还指出监测和塑造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新方法。它特别强调了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对话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强大的融汇力量与持续不断的多样化趋势相伴的方式。 ■ 2010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庆祝通过十周年

《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于2001年11月2日通过，它把文化多样性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把捍卫文化多样性作为尊重人的尊严所密不可分的一种应尽的义务。



使用PEFC认证纸印刷。

《教科文组织
世界文化多样
性宣言》海
报。

© UNESCO